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唐太宗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唐太宗传

XXX 编著

目 录

第一节	济世安民.....	002
第二节	疑兵化险.....	006
第三节	劝父起兵.....	009
第四节	直驱长安.....	015
第五节	平定西北.....	021
第六节	收复汾晋.....	027
第七节	威震关东.....	033
第八节	击败黑阔.....	051
第九节	喋血禁门.....	060
第十节	稳定政局.....	070
第十一节	贞观之治.....	081
第十二节	选贤任能.....	093
第十三节	计破突厥.....	105
第十四节	重视民心.....	111
第十五节	鼓励忠谏.....	116
第十六节	实行科举.....	123
第十七节	公道执法.....	126
第十八节	唐蕃和亲.....	131
第十九节	五大喜好.....	137
第二十节	虔诚佛事.....	145

第一节 济世安民

唐太宗姓李，讳世民。因为死后庙号“太宗”，谥曰：“文皇帝”，所以史书上通常称“唐太宗”，有时也叫作“文皇帝”。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代皇帝，是唐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太宗在位期间，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注意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国家形成一个政治清明、刑法宽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英明君主和卓越人物，的文治武功，今天仍然引人瞩目。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次子。母亲是太穆顺圣皇后窦氏。公元五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即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于高祖在武功县的别馆里。别馆，类似现在的别墅。这幢别墅是李氏家族的旧宅之一，位于武功县南十八里，南临渭水。武德六年，这幢别墅改称庆善宫，所以史书上又说：“太宗生于武功庆善宫”。据说，太宗出生的时候，有两条龙在别墅门外游戏，三天才离开。这种事，当然不足为信。

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由于追随宇文泰开创关中政权，佐周代魏有功，李虎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位极荣贵，死后追封唐

国公。祖父李昞，袭封唐公，曾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父亲李渊，年幼时袭封唐公，而且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在隋朝时，他历任谯、陇、岐等州刺史，荥阳、楼烦等郡太守，以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职务。

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即纥豆陵氏，是隋朝贵族神武公窦毅的女儿，其先世源于西北少数民族。她聪明能干，善于书法，模仿李渊的字体，十分逼真，可以使别人不能辨别。可惜，过早地于大业九年在涿郡去世。李世民孩提时较多地受到母亲的教诲，其爱好书法可能与母教有关。唐太宗对母亲的早逝十分痛惜，时常怀念。武德年间，每次举行宴会，面对诸位妃嫔，他就思念太穆皇后（窦氏），有时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

李世民有一个哥哥，名叫建成。还有几个弟弟，就是玄霸、元吉、智云。兄弟之间，建成老大，世民老二，当时人们习惯地称他们为“大郎”、“二郎”。玄霸早年夭折。智云不是世民母亲窦氏所生，在晋阳起兵后被隋朝官吏杀害，年仅十四。读过历史小说《说唐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有个很是了得的猛将李元霸。玄霸、智云很可能就是李元霸的原型。

李世民的名字是怎么取的呢？这里有个离奇的故事。据说，他4岁那年，也就是李渊到岐州任刺史的

时候，有个自称擅长算命的书生来对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见到太宗，书生又说：“龙凤的姿貌，天庭隆起的仪表，年迈二十时，必定能济世安民。”李渊怕这些话泄露出去引起麻烦，准备杀掉书生，可是，刚想动手，书生就不见了。李渊知道书生非凡人，便依书生讲的“济世安民”的意思做为太宗的名字。

李氏家族祖祖辈辈都是武将，与西北强悍的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多少年来，始终保持尚武的习俗，家庭的传统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对于这一点，李世民后来有过回忆。他说：“我小的时候，喜好弓箭，运用的熟练程度，自己感觉到已完美地掌握了它的奥妙。”又说：“少年时期，崇尚武艺，而对学业并不精心，对于怎样做君王的道理，更是茫然就像面对大海一样。”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李世民不是一个彬彬有礼、安分守己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个强悍骁勇、武艺精湛的贵族子弟。

大约在大业九年（公元六一三年），李世民16岁时，与年仅13岁的长孙氏结婚。长孙氏是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源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担任过宗室长，故改姓长孙氏。她的祖父叫长孙兕，曾担任北周的左将军，她的父亲名叫长孙晟，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看来，长孙氏家族与李氏家族一样，都是军事贵族高

门，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确实是门当户对。

长孙氏虽然出身军事贵族高门，但她爱文胜过尚武，小的时候，就喜好读书，言行举止都要遵循礼的规则。她所以养成爱文的习惯，是出于她的经历。原来，长孙氏小的时候，父亲长孙晟就病故了，处境孤单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氏是当时渤海的世族，从曾祖到父辈在北魏、北齐、隋朝等朝廷中做过显赫大官。高士廉学识渊博，精通文史，很有名望。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兄妹俩“近朱者赤”，自然喜好舞文弄墨，变得博学多才了。由于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关系，后来，高士廉和长孙无忌也加入了唐王朝的，成为李世民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助手。

第二节 疑兵化险

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四月，李渊调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家眷也随之搬到河东。这年八月，隋炀帝巡视北方边塞时，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袭击。突厥是一个游牧部落，生活在阿尔泰山一带。由于阿尔泰山形似古代叫兜鍪的战盔，俗称“突厥”，所以也把这个强悍的游牧部落呼之为“突厥”。到了隋朝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突厥已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这里说的突厥，当指东突厥。始毕可汗很厉害，一下子竟攻占了雁门一带41座城的39座。弄得堂堂的隋朝皇帝龟缩在雁门城里，而城中军队和居民加在一起，不过十五万，粮食也仅仅只能供应两旬。面对如此万分危急的形势，隋炀帝采纳了一个大臣提出的“坚城挫锐”的计策，一面坚守，一面等待救兵。雁门城被敌军团团围住，颁救兵的命令怎么传出去呢？他们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让隋炀帝颁发诏书，系在木头上，然后投入滚滚的汾水河，顺流南下，相信总有人检到诏书。

这时，李世民年满18岁，已经应募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下。云定兴部接到命令前往救援。临出发时，李世民对云定兴说：“一定要携带旗

鼓，用来虚设队伍，迷惑敌人。始毕可汗敢率军来围困天子，一定以为国家仓促间派不出援兵。如果我方部署队伍，让数十里旗帜相连，夜晚则钲鼓声相应，敌人必定会以为救兵云集，望见我军的行尘而逃去。要不然，敌众我寡，敌军全军来战，我方一定支持不住。”云定兴听从李世民的意見，安排部队在崞县宿营，只见旌旗飘扬数十里，鼓角远近相闻，不绝于耳。突厥的侦察骑兵看到后，以为隋朝大军已到，便急忙跑回大营报告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信以为真，为避免损失，慌忙撤兵北去。

以上是一个疑兵化险的故事，此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也类似。大业十二年，李世民跟随李渊到了太原。这时的李渊，先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后又升为太原留守。李渊面临的形势是复杂而危险的。前一年，就是大业十一年二月，有个叫魏刀儿的在上谷地方自称历山飞，聚众十余万举行起义。次年四月，起义军别将甄翟儿率领一支队伍骚扰太原，杀死隋朝将领潘长文。一天，李渊率兵前往征讨，行至西河郡永安县的雀鼠谷，与甄翟儿遭遇。甄翟儿在这里的部众多达二万余人，而李渊所率的步骑只有五、六千，敌众己寡，力量悬殊。在这里，李世民父子又重演了前面说到的“多赍旗鼓为疑兵”的精彩一幕。他们把部队分为二阵，瘦弱的士兵排列在中间，輜重继后，举起大片的

旌旗，战鼓和号角声震天动地，使甄翟儿产生错觉，以为所遇的官军不是小阵而是大部队。趁着甄翟儿疑惑之时，李渊率领精骑数百，在李世民的配合下，冲出了起义军的包围，化险为夷。对这次突围的经过，《旧唐书·太宗本纪》有记载。原文是这样的：“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

第三节 劝父起兵

李世民虽然年轻，但有见识，胆量过人。他看到隋王室正处于混乱之中，就暗中怀有要安定天下的抱负。

晋阳令刘文静因犯有与李密通婚的罪，被关在太原的监狱里。刘文静是朝廷命官，李密是瓦岗起义军的首领，相互通婚，自然为法律所不容。有一次，李世民去探望他。刘文静说：“天下大乱，没有汉高祖、汉光武帝那样的才能是不能安定天下的。”李世民说：“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只是人们看不出来罢了。我来探望您，不是出于儿女情长，而是打算和您商量大事。你有什么谋划吗？”刘文静说：“如今皇上到南方巡游江、淮，李密的包围逼近东都，群盗大概得以万来计算。在这个时候，若有真天子驱使驾御这些人，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城内，我做了几年县令，了解其中的豪杰之士，一旦把他们收拢来，可得到十万人。您父亲所率领的军队又有几万人，一言出口，谁敢不服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王之业就可以成功。”李世民笑道：“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于是，他就暗中布署宾客。李渊不知道这些事。李世民怕李渊不答

应，犹豫了很久，不敢向李渊说。

李渊与一个叫裴寂的人有旧谊，两人常常在一起宴饮交谈，有时昼夜相连。刘文静想让裴寂向李渊说通关节，于是就引见李世民与裴寂结交。李世民拿出自己的几百万私房钱，让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玩赌，渐渐输给裴寂，裴寂非常高兴，由此每天和世民在一起交游往来，情谊日深。李世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裴寂许诺劝说李渊。

大业十二年十二月，突厥人侵犯马邑。李渊奉命派副留守高君雅率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同力抗击。王仁恭、高君雅与突厥交战不利，李渊怕一起被治罪，非常忧虑。李世民乘机秘密地对李渊说：“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您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

实际上，类似李世民这样的意思，早几年就有人向李渊提过。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渊与士及“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李渊在涿郡的时间，当为大业九年正月，也就是说，此前四年左右，宇文士及就和李渊密谈过取天下之事。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善于占卜天象以及相面的副手夏侯端曾对他说：“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

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不是您还能是谁呢？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您不想着变通，必然是李金才第二呵。”当时民间曾传诵一首叫《挑李亲》的歌谣，隋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诛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连及李氏一家三十余口。到李渊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劝说李渊：“您的姓氏应在图讖上，名字应验歌谣，您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您好好想一想吧！”还有一些人也劝说李渊起兵。

尽管如此，听了李世民的言语，善于掩饰自己的李渊还是假装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说这种话，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向县官告发。”说着就取来纸笔，要写状表。李世民慢慢地说：“我观察天时人事到了如此地步，才敢说这样的话。如果一定要告发我，我不敢辞死。”李渊说：“我哪会忍心告发你，你要谨慎，不要随便说。”第二天，李世民又劝李渊：“如今盗贼日益增多，遍布天下，大人受诏讨贼，可贼讨尽了吗？总而言之，最后还是不免获罪。而且世人都传说李氏当应验图讖，所以李金才无罪却在一个早晨被灭族了。大人要是能将贼剿灭尽，那么功高也不会受奖，而您自己会更危险了啊！只有昨天的话可以使您避祸，这是万全之策，希望大人不要疑虑。”李渊

叹息说：“我一夜都在考虑你的话，你说的很是有理，今天就是家破人亡也由你，变家为国也由你啦！”

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没过几天，隋炀帝以李渊和王仁恭不能抵御突厥的进犯为罪，派使者来要将他们押往江都。李渊大为恐惧，李世民与裴寂又乘机劝说李渊：“如今主上昏聩，国家动乱，为隋朝尽忠没有好处，本来是将佐们出战失利，却牵连到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应该早些定大计。况且晋阳军队兵强马壮，宫监积蓄的军资财物巨万，以此起兵，还怕不成功吗？代王年幼，关中豪杰风起造反，但不知归属于谁，您要是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招抚他们并且使他们归附，这就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受一个使者的监禁，坐等被杀戮呢？”李渊认为这话很对，就秘密布置准备。将要举事时，隋炀帝又颁令不再追究李渊和王仁恭。这样，李渊他们起兵的计划也就缓行了。

根据这种情况，刘文静急切地对裴寂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您为何不早劝唐公起兵，却推迟拖延不已？……您死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误了唐公呢？”裴寂极为恐惧，屡次催促李渊起兵。李渊就指使刘文静假造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于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这是李渊打着皇帝

的合法旗号，名为“伐辽东”，实际上是在鼓动人心，为自己起兵集结队伍。到了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三月又引突厥直逼太原。这时，李世民催促父亲快快起兵，说：“大人身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如果不早定大计，灾祸今天就要到来了。”于是，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由，召集诸将佐会议，提出自行募兵。负有监视李渊行动使命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迫于非常形势，只好同意，同时，也委婉地提醒李渊，募兵是为了对付刘武周，要跟隋王朝休戚与共，决不可另有图谋。既已同意，李渊就命令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各自募兵。远近的百姓投奔汇集，十天之内有近万人应募。这支队伍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私自控制和直接指挥的，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

就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加快军事部署的步伐时，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眼看募兵云集，怀疑李渊有异志，便暗中策划晋祠祈雨大会。晋祠位于今太原市西南25公里的悬瓮山下。王威、高君雅想把李渊诱骗到这里，加以杀害。这个阴谋恰好被经常出入于王、高家的晋阳乡长刘世龙了解，刘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李渊父子。李渊和世民、刘文静等商量后，决定先发制人。5月14日夜里，李渊派李世民率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外面。5月15日的早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坐

在一起处理政务，这时，只见刘文静引着开阳府司马刘政会进来立在厅堂上，声称“有密状，知人欲反。”李渊故意叫王威先看，刘政会却不给，说：“告发的是副留守的事，只有唐公才能看。”李渊佯作吃惊地说：“难道有这样的事？”他看了状子才说：“王威、高君雅暗中勾引突厥入侵。”高君雅捋起衣袖大骂道：“这是造反的人要杀我。”这时，李世民已经在大路上布满了军队。高君雅还想争辩，刘文静一声令下，埋伏在后面的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一跃而出，将王、高抓起来投进监狱。正在这时，恰逢突厥数万骑兵入侵太原，其轻骑从外城北门进入，从东门出去。李渊命令裴寂等人率兵防备，而把各城门都打开，突厥人不知虚实，不敢进入。由于如此巧合，大家都以为确实是王威、高君雅把突厥人招来的，李渊便“名正言顺”地把他俩杀掉了。这就是著名的晋阳宫事变，它标志着李渊、李世民父子公开起兵了。

第四节 直驱长安

晋阳的南面是西河郡，郡丞高德儒很不识时务，当李渊传檄至该郡的时候，竟表示不服从，于是，李渊“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取西河，是李氏父子晋阳起兵后第一战，胜败关系到李唐王朝的帝业，因而十分重视。临行前，李渊对太原令温大有说：“我儿子年轻，请您参与谋划军事，事情的成败，在此行就可预测出来了。”起义部队的士兵都是新近招募的，没有经过训练检阅。李建成、李世民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敌人身先士卒。附近道旁的蔬菜瓜果，不是买的不准吃，兵士有偷吃的，立即找物主给予赔偿，也不责备偷窃者，士兵及百姓们对李氏兄弟都心悦诚服。义军到达西河城下，高德儒闭城拒守，但很快就被攻破。抓住高德儒后，李世民历数其罪过，说：“你指野鸟为凤凰来欺骗君主，骗取高官，我们兴义兵，正是要诛灭奸佞之人。”随后，将高德儒处死，其余官员一个不杀，秋毫无犯，分别抚慰吏民百姓，让他们各复其业，远近的百姓听到后非常高兴。西河首捷，往返仅九天，李渊高兴地说：“像这样用兵，就是横行天下也可以了。”于是就订下了直取长安的计划。此役后，设置大将军府，分为三军。封李建成为陇西

公、左领军大都督，指挥左三军。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军。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温大雅为记室，温大有参与机密，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为统军。形成了取天下的军事、政治机构。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誓师于野，留三子元吉守太原，亲自率领建成、世民共三万人马南下。隋朝虎牙郎将宋老生驻霍邑，他以精兵二万阻挡义师前进。这时，雨下了很长时间还不止，军队缺粮，又流言突厥乘虚侵袭太原，李渊召集将领僚佐们商议向北返回。裴寂等人都说：“宋老生、屈突通联合居守险要，不容易很快攻下……太原为一方的都会，而且义兵的家属都在太原，不如返回救援根本之地，再筹划今后的义举。”李渊同意此议，而李世民反对说：“现在稻谷遍野都是，还愁无粮吗？宋老生为人轻狂浮躁，一战就可以擒住他。李密舍不得粮仓粟米，顾不上向远方图谋。刘武周和突厥人表面上虽然相互依赖，但实际上却互相猜忌。刘武周虽然追逐远利而攻取太原，但岂肯忘记就近的马邑呢？我们本来是兴大义，奋不顾身地拯救百姓，应当先行进入咸阳，号令天下。现在只遇到了小敌，立刻就要回师，恐怕跟随起义的人一旦解体，返回去守卫太原一城之地，我们就成贼了，怎么能保全自己呢？”李建成也认为李世民的话对，

但李渊不听，催促军队出发。李世民再要进入李渊的营帐劝阻，天黑了，李渊已经躺下休息。李世民进不去，就在帐外号哭，哭声传到帐中，李渊召见世民问话，世民说：“如今我们举兵是为大义，进军攻战就能取胜，后退就会溃散，到那时，部众溃散在前，敌军追击在后，我们被灭亡的日子就到了，怎么能不悲伤呢？”李渊醒悟过来，说：“军队已经出发，我们怎么办呢？”李世民说：“右军整装而未发，左军虽然出发，估计还没走远，请让我去追赶他们。”李渊笑道：“我的成败都在于你，知道了还说什么呢？随你去做吧。”李世民和李建成连夜把左军追了回来。过了几天，太原的粮食也运到了。

到了八月初，雨停了。李渊命令部队晾晒铠甲、器械、行装。初三早晨，李渊率军从山脚下的小路向东南直抵霍邑。李渊怕宋老生不出战，李建成、李世民说：“宋老生有勇无谋，我们用轻骑向他挑战，按理他不会不出战，待他从营垒出来，我们就诬陷他对我们有贰心，他害怕被左右的人奏报，怎敢不出战呢？”李渊和几百名骑兵先到霍邑城东面几里的地方等待步兵，派李建成、李世民率领几十骑到城下，举鞭挥旗就像要包围城池的样子，并且辱骂宋老生。宋老生大怒，率三万人从东门、南门分道出战。李渊派殷开山立刻去召集后军，后军来到后，李渊想让军士们先吃

饭再战斗，李世民说：“机不可失！”李渊就和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在城南列阵。李渊、李建成与宋老生交战，稍有退却，李世民与军头临淄人段志玄从南原率兵驰马而下，冲击宋老生的军阵，出击宋老生军的背后。李世民亲手杀死几十人，两把刀都砍缺了口，飞溅的鲜血沾满衣袖，世民将血甩掉再战。李渊的兵势振奋起来，就传话呼喊：“已经抓住宋老生了！”宋老生军因此而大败。李渊的兵士迅速直抵城门，城门关闭了。宋老生下马跳入壕沟，刘弘基就将他杀死。隋军的死尸遍布几里。天黑了，李渊命令登城，当时没有攻城的器械，将士们赤膊登城，攻下霍邑。

平霍邑后，又接连攻取临汾郡和绛郡。到了8月15日，李渊到达龙门。九月，义师包围河东。河东是战略要地，宛如关中之门户。隋朝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闭城拒守，攻之不克。这时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第二次分歧。裴寂主张：“屈突通拥有大批军队，凭借着坚固的城池，我们若舍弃他而去，要是进攻长安而不能攻克，后退就会遇到河东方面的追击，腹背受敌，这是危险的策略。不如先攻下河东，然后挥师西上。长安是依恃屈突通为后援的，屈突通被打败，长安也必定被攻破。”李世民说：“不对！兵贵神速，我们乘着屡战屡胜的军威，安抚归顺的民众，大张旗鼓地

西进，长安的人就会望风而震惊骇惧，智谋还来不及谋划，勇敢还来不及决断，取长安就如同震动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我们要是滞留，自己将自己耽误在坚城之下，他们则有时间加强防备以对付我们，而我们就白白浪费了时间，大家的心就会沮丧溃散，那么大事就全完了。况且关中蜂拥而起的将领还没有归属，不能不早些将他们招抚来。屈突通是自己将自己囚禁起来，不足为虑。”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李渊采取“两从之”的办法，分兵两路，大军渡河入关，重点攻取长安，同时留相当兵力对付屈突通。

李渊父子率主力部队渡河后，建成和刘文静等屯守永丰仓和潼关，防备来自东面的敌兵；李世民率统军刘弘基、长孙顺德等数万人定渭北，包括泾阳、云阳、武功、 诸县。自谓北徇三辅，李世民所至皆下，甚得人心。《旧唐书·太宗本纪》载：“三辅吏民及诸豪猾诣军门各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收纳英俊，以备僚列，远近闻者，咸自托焉。”例如，（β显）城尉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世民一见，便如故旧，任命他为记室考军，引为谋主。玄龄也自以为遇知己，竭尽全力，知无不为。

不久，刘弘基等南渡渭水，驻屯长安故城。李世民则引兵赴司竹园，收编了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所率徒众，驻扎在原秦阿房宫城，号称胜兵十三万。

接着，李世民派人报告李渊，请即赴长安。李渊表示同意，命建成率精兵赴长乐宫，世民率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十月，李渊到达长安，设营于春明门之西北。京城被二十万大军围困，到十一月，终于攻克。随即，李渊立隋代王侑为皇帝，即隋恭帝，改元为隋义宁元年。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独揽军国机务。以建成为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元吉为齐公；以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义宁二年三月，李世民改封赵公。五月，隋恭帝禅位，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改元武德，都长安。武德元年六月，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不久，立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由于秦王李世民参与“首义”，军功显赫，故在新王朝里占据重要的地位。

第五节 平定西北

讨伐薛举、薛仁果父子的战争，是唐初统一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李世民在这次战役中挂帅亲征，经历了“胜利——失败——胜利”的曲折过程，表现了他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日渐成熟。

薛举，汾阳人，侨居于金城郡（治所在今甘肃兰州）。他骁勇无比，有万贯家财，喜好结交豪杰人士，称雄于西部边地。大业十三年四月，据郡起兵，开仓赈贫，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封儿子仁果为齐公，幼子薛仁越为晋公，招集群盗，抢掠官府的牧马，很快就占有陇右之地，拥有部众达13万。七月称秦帝，立妻子鞠氏为皇后，儿子薛仁果为皇太子。薛仁果很有力气，善于骑射，军中号称万人敌。他生性贪婪、残忍、嗜杀成性，曾经抓住庾信的儿子庾立，他因庾立不肯投降而发怒，将庾立在火上分尸，然后一点点地把肉割下来让军士们吃。待他攻下了天水，就把天水的富人都召来，倒吊起来，用醋灌鼻子，向他们索取金宝。之后，薛举父子又袭击并攻取了源，收编了唐弼的部众，势力越加壮大，其部众号称30万人。薛氏父子起兵是陇右豪强地主叛隋的行动，其性质与李渊起兵一样，而且进军目标也都是指向关中。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李世民父子抢先攻占长安。十二月，薛举父子获悉此事，便以十万兵力进逼渭水之滨，包围了扶风郡城，构成了对李渊势力的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挺身而出，率兵在扶风反击薛仁果，大破薛仁果军，并追击到坵坻才返回。薛举大为惊慌，问他的臣属：“自古有天子投降的事情吗？”黄门侍郎钱塘人褚亮说：“赵佗归附汉朝，刘禅侍奉晋室，近代的萧琮，到现在还地位显赫高贵，这种转祸为福的事自古就有。”卫尉（夕即）郝瑗快步上前说：“陛下不应该问这种事！褚亮的话又是多么荒谬。从前汉高祖经过多少次逃亡和失败，蜀汉的先主刘备屡次失去妻室儿子，但他们最后都完成了帝业，陛下怎么能因为一次失利，就要做亡国的打算呢？”薛举后悔了，说：“我不过拿这话试试你们罢了。”这次前哨战的胜利，对于李渊父子来说，意义重大，不仅鼓舞了士气，使他们在关中立稳了阵脚，并且便于向外发展。同月，平凉留守张隆、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接着，又取得了巴、蜀之地。

薛举不甘于失败，企图勾结突厥，重新“谋取京师”。武德元年五月，李渊称帝。六月，薛举就入侵泾州，纵兵掳掠，直至豳州、岐州一带。刚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以西讨元帅的名义，和刘文静、殷开山

等率八总管兵前往抗击。七月，双方对垒于高墟（今陕西长武县北）。李世民加深壕沟，加高壁垒，不和薛举部交锋。正当这关键时刻，李世民得了虐疾，卧于军中，把指挥大权委托给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人，并告诫二人：“薛举孤军深入，粮食不多，士卒疲惫，假如来挑战，小心不要应战。等我的病痊愈后，和你们一起打败他。”退下后，殷开山对刘文静说道：“王爷担心您不能退敌，才说这番话。贼兵听到王爷有病，必然轻视我们，应该显示一下武力以威慑敌人。”于是，他们在高墟西南列阵，仗着人多不加防备。结果，薛举以精锐的轻骑从背后包抄掩袭，唐军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阵亡，高墟城也陷落了。李世民和残军退回长安，“京师骚动”，惶然不安。刘文静等人均因此被罢官。

武德元年八月，薛举获胜后，有人建议“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薛举同意这种意见，可恰巧在大军出发前，他病死了，薛仁果继位。8月17日，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元帅，攻打薛仁果。九月，唐军临近高墟，就“坚壁不动”。诸位将领请战，李世民说：“我军才打了败仗，士气沮丧，对方仗着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们的意思，我们应当在营垒中耐心等待。他们骄傲，我们奋勇，就可以一仗打败他们。”他命令全军：“有敢请战的，

斩首！”双方相持了60多天，薛仁果的军队粮食吃完了，将领梁胡郎等人率领各自的队伍来投降。李世民了解到薛仁果手下的将领士卒有离异之心，便命令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原扎营引诱薛仁果部下。薛的部将宗罗睺知道后非常高兴，出动全部精锐攻梁实，梁实守住险要不出战。营地中没有水源，好几天人马没有水喝。宗罗睺的攻击很猛烈。李世民估计对方已经疲劳，就对诸位将领说：“可以打了！”快到天亮，李世民让右武侯大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列阵。宗罗睺合兵攻庞玉，到庞玉几乎不能坚持时，李世民率领大军出其不意从浅水原北面出现，宗罗睺率军迎战，李世民率几十名骁骑勇猛冲击敌阵。唐军内外奋力拚搏，呼声动地。宗罗睺的部队大败。接着，世民率领2000多骑兵追击宗罗睺，窦轨扣住马绳苦苦劝道：“薛仁果还占据着坚固的城池，我们虽然打败了宗罗睺，但不能轻易冒进，我请求暂且按兵不动，观察一下薛仁果的动静。”李世民说：“我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现在我军取胜势如破竹，机不可失，舅舅不要再说了。”于是进军。薛仁果在城下列阵，李世民依泾河面对薛仁果营地，薛仁果手下的骁将浑干等人到唐军阵前投降。薛仁果害怕了，带兵进城拒守。天快黑时，唐大军相继到达，包围了城池。半夜，守城的人纷纷下城投降。薛仁果无计可施，第二天出城投降。

这一仗，唐得薛仁果一万多精兵，五万名男女。战争胜利后，诸位将领向李世民祝贺，问：“大王一仗就取得了胜利，骤然舍弃步兵，又没有攻城的用具，轻骑直到城下，众人都认为无法攻克城池，却很快就取胜，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宗罗睺部下都是陇山之西的人，将领骁勇，士卒剽悍；我有意出其不意打败了他，杀伤不多。如果迟迟不追击，则都返回城内，薛仁果加以抚慰再派他们作战，就不容易战胜了；如果迅速追击，则跑散回到陇山之外，折墟城虚弱，薛仁果吓破了胆，没有时机谋划，这就是我胜利的原因。”众人都心悦诚服。李世民把投降的士兵全部交给薛仁果兄弟以及宗罗睺、翟长孙等人统领，和他们一起打猎，丝毫不加怀疑戒备，这些人畏惧李世民的威严，又感谢李世民的恩德，都愿以死效劳。唐高祖派遣使者对李世民说：“薛举父子杀了我们很多士卒，务必杀光他们的同党以谢死去的冤魂。”不久前归顺唐的李密进谏说：“薛举残暴地杀害无辜者，这正是他灭亡的原因，陛下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怀柔收服薛氏的百姓，不能不加安抚。”于是下令杀主要谋划者，其余的人都给予赦免。11月22日，取得巨大胜利的秦王李世民凯旋回长安，薛仁果斩首于市。12月2日，唐高祖下诏以秦王李世民为大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

都受其指挥。

讨伐薛举、薛仁果父子的这一场战争，前后进行了近一年，开始小胜，继而大败，最后大胜。这次战争的胜利，解除了唐王朝来自西北方面的威胁，消灭了想夺取关中政权的强劲对手。战争胜利后，因在高塘之战中失利被撤职的刘文静封为户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恢复了殷开山的爵位。

第六节 收复汾晋

李世民指挥取胜的第二个大战役，是平殄刘武周。这次战役，从武德二年十一月出征，到第二年四月结束，总共半年时间。战争进行当中，李世民巧妙运用“坚壁挫锐”的方略，使唐军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从接连溃败到大获全胜，整个战争是惊心动魄的。

刘武周是河间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迁居马邑（今山西朔县），任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二月，与同郡张万岁等杀太守王仁恭，聚众万余人，自称太守。他依附突厥贵族，攻占雁门、烦楼、定襄等郡，突厥封其为“定杨可汗”，给以狼头，自称皇帝，年号天兴。武德二年三月，在突厥的支持下，南侵并州（治晋阳）。四月，接受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宋金刚是个什么人呢？他原是易州起义者的首领。当时，有一万多人马，与另一起义军首领魏刀儿相联结。窦建德进攻魏刀儿的时候，宋金刚在救援当中被战败。于是，他带领4000人马向西投降了刘武周。刘武周听说宋金刚会用兵，非常高兴，称他为宋王，将军事大权交给他，并将自己财产的一半送给宋金刚。宋金刚也深加交结，休掉原来的妻子，娶了刘武周的妹妹。刘武周任命宋

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这时的宋金刚，领兵二万，依靠突厥，气势很盛。一时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担任并州总管的齐王李元吉抵挡不住。接着，榆次被攻陷，太原处于危急之中。五月，陷平遥。六月，攻取介州。李渊忧心忡忡。为了扭转战局，决定派右仆射裴寂来前线督军抗击，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听其相机行事。

可是，裴寂也未能改变战场的形势。裴寂到介休，宋金刚凭借城池抵抗。裴寂在度索原扎营，军士饮用山涧里的水，宋金刚就切断水源，使唐军的士兵因干涸失去战斗力。裴寂想转移营地靠近水源，宋金刚便趁机挥兵进攻，于是，裴寂的军队溃败，几乎全军覆灭，裴寂本人只身逃回晋州。紧接着，刘武周进逼太原，齐王元吉半夜带着妻妾逃离，奔赴长安。李唐王朝的发迹地竟在旦夕之间陷落了。李渊惊呼：“晋阳有几万强兵，有足够吃十年的粮食，王业兴起的根基，一下就丢弃了。”十月，宋金刚进攻并攻克了涇州和晋州。而且，由于裴寂怯懦，错误地实行焚烧政策，百姓惊恐不安，忧愁抱怨，都想去当强盗，夏县居民吕崇茂聚众起义，响应刘武周，裴寂去讨伐，竟被吕崇茂打败。消息传到长安，朝野一片震惊。

就在这种十分险恶的形势下，李渊慌忙颁发手敕：“贼势到如此地步，很难与他们抗争，宜放弃黄河以

东地区，谨守关西。”秦王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上表称：“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地区富饶，京城靠它供给，如果全部放弃，臣深感愤恨。希望给臣三万精兵，必定可望消灭刘武周，收复汾、晋。”于是，高祖征发关中所有兵力扩充李世民的部队，让他挂帅讨伐刘武周。李渊亲自到长春宫为秦王送行。

十一月，正值隆冬季节，李世民乘河冰坚硬，带兵从龙门渡过黄河，驻扎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当时黄河以东的州县遭抢劫后，没有粮仓，人人惧怕侵扰，聚居在城堡中，征集不到东西，军队缺粮。面对这种情况，李世民坚决改变过去裴寂那一套扰民的做法，想方设法安抚人心。他发布王教晓谕百姓，百姓听说李世民率军前来，踊跃归顺，由近及远，前来的人日益增加，然后唐军逐渐征收粮食，军粮因此充足。于是休兵喂马，只命小部队乘机抄掠敌军，大军则坚壁不战，宋金刚的势力因此日益衰落。一次，李世民带轻骑兵去侦察敌情，随从的骑兵四下分散，只和一名穿铠甲的士卒登上山丘睡觉。不久，敌人从四面包围了他们二人。开始，二人毫无知觉，恰巧蛇追老鼠，碰到了甲士的脸，甲士惊醒后发现敌情告诉了李世民，二人一起上马，才走了百余步，就被敌人追上，李世民用大羽箭射死了敌人的骁将，敌骑兵于是退去。

坚壁了一段时间，各位将领不耐烦了，都请求与

宋金刚交战。李世民说：“宋金刚孤军深入，麾下集中了精兵猛将，刘武周占据太原，依仗宋金刚为屏障。宋金刚的军队没有储备，靠掠夺补充军需，利于速战。我们关闭营门不出，养精蓄锐，可以挫败他们的锐气。分兵攻汾州、（β显）州，骚扰他的心腹之地，他们粮尽无计可施，自然会退军。我们应当等到那时再战，目前不宜速战。”

双方对垒相持5个月后，宋金刚以军粮困乏，部队大馁，不得不后撤。秦王率军奋勇追击，至吕州追上了宋金刚部将寻相。打了大胜仗后，又继续追击，一昼夜走了200多里，打了几十仗。到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抓住马的缰绳规劝道：“大王打败敌人，追到这里，功劳已足够了，不断深入，就不爱惜自己吗？况且士兵们饥饿疲惫，应当在此停留扎营，等到兵马粮草都齐备了，然后再进击也不晚。”李世民说：“宋金刚无计可施才逃跑，军心涣散；功劳难立而失败颇易，机会难得，转瞬即逝，一定要趁此机会消灭他。如果我们停止不前，让他有时间考虑对策加以防备，就不可能轻易打败他了。我尽心竭力效忠国家，怎么能只顾惜自己的身体呢？”于是，催马追击，将士们也不敢再提饥饿。唐军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刚，一天交锋八次，都打了胜仗，俘斩敌军数万。当晚，在雀鼠谷宿营。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吃上饭，三天不解

甲睡觉。部队里能吃的只剩下一只羊。将士们都很饿，李世民就和大家分吃了这只羊。接着，李世民带兵赴介休城。这时，宋金刚尚有二万部队，出西门，背城而阵，欲决死战。李世民命李世（责力）、程咬金、秦叔宝当其北，翟长孙、秦武通当其南，他本人则亲率3000精骑冲其阵后，结果，宋金刚大败而逃。李世民追出几十里，来到张难堡，摘下头盔示意堡垒，据守堡垒的军士认出李世民，都欢呼雀跃，高兴得流下泪来。随从告诉守军：秦王还未进食。守军便献上混酒、粗米饭，秦王吃得很香。

在张难堡，敌军将领尉迟敬德、寻相等率余部八千来降。敬德籍属朔州，武勇善骑，是一位杰出的精骑将领。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非常高兴，引为右一府统军，并让他仍然统领八千旧部。有人担心，敬德会叛变。李世民不听，说：“昔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并能毕命，今委任敬德，又何疑也。”

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失败，大为惊恐，便带了百余骑弃太原北走，亡奔突厥。宋金刚收拾残部，准备再战，但部众都不肯跟随他与唐作战，于是宋金刚也和一百多骑兵逃往突厥。不久，宋金刚打算跑回上谷，被突厥捉回，腰斩。

刘武周当初南侵犯唐时，他的内史令范君璋曾规劝道：“唐主以一个州的兵力，直取长安，所向无敌，

这是上天有助，不是人力。晋阳以南，道路狭窄险要，孤军深入，后无援军，假如进军攻战不利，怎么回军？不如北面联合突厥，南面与唐结交，在此一方称王称霸，才是长远之计。”刘武周不听，留范君璋守卫朔州，自己率军南侵。刘武周失败后，流着泪对范君璋说：“我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以至于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过了一段时间，刘武周策划从突厥逃回马邑，事情泄露，被杀。突厥人任命范君璋为行台，统领刘武周的余部。

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李世民圆满完成使命，收复了并、汾旧地，消灭了又一个“争天下”的强大敌人，为巩固初生的唐朝政权立了殊勋。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不仅在指挥上是杰出的，在军事作风上也堪称模范，一个封建时代的军事指挥者，能够在战斗中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战役结束以后，李世民留将领李仲文镇守并州，自己则引军凯旋长安。

第七节 威震关东

唐初统一战争期间，规模和声势最大的一次战役，是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秦王李世民指挥的对王世充包括窦建德的征讨。这次战役，历时十个月，前八个月重点是攻打王世充，后两个月主要是镇压窦建德的势力。

王世充，隋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人。本姓支，祖籍西域。隋炀帝时任江都郡丞，因镇压朱燮、管崇、孟让等起义军，升江都通守，又击破格谦起义军，后为瓦岗军所败。大业十四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杀以后，留守东都（今河南洛阳）的隋朝官员拥戴隋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年号为皇泰。封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与段达、元文都、皇甫无逸以及卢楚、郭文懿、赵长文等共同掌握朝政，时人称为“七贵”。

有一次，皇泰主的国子祭酒儒生徐文远出城打柴，被瓦岗军捉住。这位徐文远是瓦岗军首领李密的老师。李密让徐文远朝南坐，自己尽弟子的礼节，朝北拜徐文远。文远说：“老夫我既然受了厚礼，不敢不畅所欲言了！不知道将军的志向是不是打算像伊尹、霍光那样扶助朝廷于危难之中？那老夫虽然年迈，仍愿意

尽力相助；假如是像王莽、董卓，乘国家危难谋利，那老夫是没有什么用的！”李密叩头说道：“不久前奉了朝廷命令，位列上公，希望竭尽有限的力量，挽救国难，这才是密本来的愿望。”徐文远说：“将军您是名臣之子，失足才落到今天的局面，如果能趁走得不太远及早回头，仍然不失为忠义之臣。”不久，在一场内部争斗中，王世充杀了元文都、卢楚、郭文懿、赵长文等人以后，皇泰主封王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于是，王世充从含嘉城搬到尚书省，逐渐联结党羽，恣意横行，作威作福。他让哥哥王世恽为内史令，住在宫内，子弟都掌握兵权，把政事分为十头，全部交给同党主持，势震内外，人人争相趋附。等到这时，李密再向徐文远请教对策。徐文远说：“王世充也是我的弟子，为人残忍狭隘，造成这种形势，必然有别的企图。将军您原来的计划不合适了。不打败王世充，不能入朝。”

李密与王世充之间的决战没过多久就展开了。由于李密轻敌，听不进裴仁基、魏徵等人的正确意见，结果大败，部队分崩离析，他自己带着忠于他的两万人入关降唐，其他将帅大多归顺了隋。击溃瓦岗军以后，皇泰主封王世充为太尉、尚书令，总督内外诸军事，又让他开太尉府，备置官属。王世充成为这个地区的强大集团。

开始的时候，王世充对皇泰主礼节相当谦敬。以后，便变得骄横了。有一次，他在宫中吃了赏赐的食物，回到家里大吐，便怀疑食物被人下了毒，自那以后，王世充就不再上朝拜谒了。皇泰主知道王世充最终不会甘当下臣，而自己又无力制服他，只能从仓库中取出丝织品，做了许多幡花；又拿出各种衣服玩物，让僧人到处施舍给穷人，以求福运。可是，王世充让党羽把守住章善、显福二门，宫内的杂物，毫厘也不得拿出去。他还让人晋献印玺和宝剑，又说黄河水清了，想以此眩惑众人，为自己制造祥瑞。不久，王世充派段达等人对皇泰主说明，请求授予他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赠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如车马之类，一些权臣篡位之前，要先赐九锡。皇泰主说：“郑公新近平定了李密，已经官拜太尉，从那以来，没有特别的功劳，待天下逐渐平定，再论此事也不晚。”段达说：“太尉想加九锡。”皇泰主紧紧盯着段达，说：“随您便！”于是，段达等人以皇泰主的名义下诏命王世充为相国，借给他饰有黄金的斧头，使他有权征伐四方，总理百官政务，爵位晋封为郑王，加九锡，郑国可设置丞相以下官员。武德二年四月，王世充正式篡夺帝位，国号郑，改元开明。这时的王世充集团，势力虽然强大，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派系勾斗。由于王世充性情多疑、残酷多诈，

将领没有安全感，时有叛离。名将秦叔宝、程知节等先后降唐，成为李世民军队的骨干力量。势力强大的王世充集团正在走下坡路。

几年前，也就是李渊父子攻占西都长安以后，也是想进一步谋图东都洛阳的。武德元年正月，命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直奔东都。四月，进军至东都，扎营于芳华苑，但无法入城。李世民提出：“我们平定关中不久，根基还不牢固，即使得东都，也不能守住！”于是，引军而还。李世民预料部队撤退时，隋军会追击，就在三王陵设下埋伏。果然，隋将段达率一万多人追来，遇上伏兵，被打得大败。后来，唐王朝为了对付主要的危险薛举父子，调秦王李世民到陇右抗击，就无暇东顾了。直到打败了刘武周，解除了东北侧面的威胁，也就是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才把战争的重点转移到关东地区，以对付并消灭王世充集团。

武德三年7月1日，高祖下诏命秦王李世民统率诸军攻打王世充。唐军气势磅礴，直驱河南。王世充探知，急忙从各州选拔骁勇，集中洛阳。7月21日，李世民到达新安，王世充带军坚守洛阳四城和周围重镇。很快，唐将罗士信率先头部队包围了慈涧，王世充带部队前往救援。7月28日，李世民带轻骑去前线察看军情，突然遭遇王世充的部队。双方人数相差

悬殊，道路又很艰险。李世民被敌军团团包围。这时，只见秦王策马飞奔，左右开弓，敌人应弦而倒，并抓获敌左建威将军。敌人畏于李世民的威势，退军。李世民返回营地，满面灰尘，部下认不出来，将他拒之门外，世民摘下头盔发话，才进了军门。次日，李世民率领五万步兵和骑兵开赴慈涧，王世充退回洛阳，一些州城也纷纷降唐。紧接着，李世民作了重要部署：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伊阙之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切断东都粮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同时，李世民亲率主力大军驻扎洛阳北面的北邙山，连营进逼洛阳。这样，筑成了对东都的包围圈，断绝其粮饷供应，使王世充陷于孤立挨打的境地。

8月14日，怀州总管黄君汉派校尉张夜叉用水军攻克洛城，捉守将达奚善定以后，王世充在青城宫列阵，秦王也列阵相应。隔着滚滚的河水，王世充对李世民说：“隋朝灭亡，唐在关中称帝，郑在河南称雄，我王世充未曾向西侵唐，而秦王您却忽然率军东来犯郑，这是为什么？”李世民让宇文士及答复道：“普天之下均敬慕皇帝的声势教化，唯独阁下不讲声教，我们就为此事而来！”王世充说：“我们互相息兵讲和，不是很好吗？”宇文士及又回答：“奉诏命令我们攻取东都，没有命令我们讲和！”到傍晚，双

方各自带兵回营。九月，唐军陆续控制了东都外围的大多数军事据点，河南郡县相继前来归附。

这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于已经降唐的原刘武周将领寻相等人大都又叛唐而去，唐军诸将怀疑尉迟敬德可能会叛离，便轻率地将他囚禁在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向李世民进言：“尉迟敬德骁勇绝伦，现在被囚禁，内心必然怨恨，留着恐怕会成后患，不如索性杀了他。”李世民说：“不可，敬德如果真要叛离，又怎么会在寻相之后呢？”马上下令放开尉迟敬德，把他带入卧室，赐给金子，世民说：“男子汉大丈夫相互之间讲的是意气相投，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介意，我最终没有相信谗言而害了忠良，您应该明白。如果您一定要走，这点金子就算作路费，以表这一段共事之情。”9月21日，李世民带五百骑兵巡视战区地形，登上魏宣武帝陵，正当这时，王世充率领一万多步兵和骑兵到达此地。敌军包围了李世民。郑将单雄信持长枪直奔李世民，尉迟敬德立即跳上马大喊着将单雄信刺下马。见状，王世充军稍稍后退。敬德护卫着李世民突围，所向无敌，出入王世充的部队，如入无人之境。随即，唐将屈突通率大军赶到，将王世充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此役，活捉了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敌首级1000多，俘虏6000多，王世充本人只身逃脱。遭遇

战结束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您的回报？”赐给敬德一箱金银。从此，尉迟敬德日见宠遇。李世民器重敬德，一在于他的忠诚，二在于他的武艺。尉迟敬德善于避让长矛，每次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敌人密集的长矛刺来，怎么也伤不了他，他还能夺取敌人长矛回刺过去。齐王李元吉颇以擅长骑术和使长矛自负，听说尉迟敬德的名声，请求各自去掉枪头相互较量，一决胜负。尉迟敬德说：“敬德自当去枪头，王不必去。”比武时，元吉始终刺不中敬德。秦王问尉迟敬德：“夺矛和避矛哪个难？”敬德回答：“夺矛难。”于是秦王又命尉迟敬德夺齐王手中的长矛。李元吉手持长矛跳上马，一心要刺中尉迟敬德，但尉迟敬德只一会儿就三次夺了李元吉的长矛。元吉虽然脸上一副惊叹诧异的样子，内心却深以为耻。

唐郑之间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唐军的智谋者运筹帷幄，尽遣奇策，积极打击对方。武德四年正月，唐军开展的“黑衣行动”，使敌遭受惨重的损失。秦王挑选一千多精锐骑兵，全部黑衣黑甲，编为左右两队，分别由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统领。每次作战，李世民都亲自披上黑甲，率领将士作为先锋，乘机进击，所向披靡，令敌人畏惧。一次，屈突通和窦轨带兵巡行营屯，突然与王世充遭遇，交战后

不利，这时，秦王带领黑甲队救援，打败了王世充军的进攻，俘虏、歼灭敌人6000多，其中包括俘虏骑将葛彦璋。二月，唐军探知王世充的儿子王玄应率兵数千，从武牢运粮到洛阳。李世民立即派遣将军李君羨组织截击，使王玄应的运粮部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随着战争的发展，武德四年2月13日，李世民将军营移至洛阳城西北的青城宫。青城宫原为王世充陈兵之所，被迫撤退时大肆破坏防御工事。唐军刚到，壁垒尚未修好，王世充就率二万兵马猛烈反扑，他们凭借旧马坊的墙垣沟堑展开攻击，使唐军诸将大为惊慌。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让精骑在北邙山列阵，自己登上北魏宣武帝陵观察郑军阵势。他对身边的人说：“贼子的兵力已窘迫了，倾巢而出，想侥幸打一仗，今日打败他，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出战了。”李世民命令屈突通率五千步兵过谷水进攻王世充，并告诫屈突通：“军队一交锋立即放烟火。”不一会儿，烟火升起。李世民即带领骑兵向南冲击，身先士卒，与屈突通汇合兵力奋力战斗。为了了解王世充军阵兵力分布情况，李世民带领几十名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不可阻挡，杀伤很多敌人。不久，因长堤所限，李世民和众骑兵走散，唯有将军丘行恭紧紧跟随着。数名敌骑兵追上来，射毙了李世民的坐骑。丘行恭立即调转马头，

射击追赶的郑兵，箭无虚发，追兵不敢向前。丘行恭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秦王，自己在马前步行。他手挥大刀跳跃大喊着奋力斩杀，冲出了王世充军阵，得以回归唐军大部队。王世充也率领部队殊死战斗，军队几次三番被打散后又重新集合起来继续进攻，从上午七八点钟战至中午，部队才撤退。李世民挥军追击到洛阳城下，俘虏、歼灭了7000人。到此时，唐军完成了对东都洛阳的包围，王世充婴城固守，不敢复出。

洛阳城的防御十分严密，大炮可以将50斤重的石头射出200步远，八弓弩的箭杆像车辐，箭镞如同巨斧，可以射500步远。唐军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十几天下来，还是不能攻克。城中先后有13人想倒戈应唐，均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被王世充杀死。唐军将士都疲惫不堪想回关中，连总管刘弘基等也请求班师回朝。李世民说：“如今大举而来，应当一劳永逸。洛阳以东的各州已望风归附，唯有洛阳一座孤城，其势已不能持久，成功在即，怎么能放弃而回朝呢？”于是下令全军：“洛阳不破，决不回军，再有胆敢提出班师的一律斩首。”高祖听说以后，曾下密敕让李世民还军。李世民上表说明洛阳必定可以攻克，同时，又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回朝面陈军事形势。封德彝对高祖说：“王世充得到的地方虽然多，但都只不过是加以笼络略有联系的部属，实际号令所能管辖的只不

过洛阳一城而已，他已经智尽力穷，克城之日就在近期之内。现在如果回师，他的势力重新振作起来，再加上各地互相联合，以后要想消灭他就难了！”高祖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

正当围困洛阳将下而未下的时候，河北农民军首领窦建德以十几万之众，号称30万，向西溯黄河而上，突然出现在唐军的背后。这是怎么回事呢？

窦建德，清河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农民出身。曾为里长。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任二百人长。因助孙安祖起义，家属遭杀害，遂率部起义，投高鸡泊起义首领高士达，任司兵。大业十二年为军司马，击杀涿郡通守郭绚。高士达牺牲后，他继为领袖，称将军，拥众十余万。十三年于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攻占信都、清河等郡。河间之战，歼灭隋将薛世雄部三万余人，声势大振，随即攻下河北大部郡县。据说，有五只大鸟落在乐寿，数万只鸟随着大鸟，经过一天才离开。窦建德以为是自己的祥瑞之兆。宋城有人得玄圭献给窦建德，他的部属说：“这是上天赐给大禹的，请将国号改为夏。”窦建德听从他们的请求，称夏王，建都乐寿，改年号为五凤，国号夏。五凤二年（公元619年）迁都豪州（今河北永年东南）。窦建德每次打了胜仗，攻陷城池，得到的物资财产，全部用来分给将士，自己

不留任何东西。他生活简朴，不吃肉，经常吃蔬菜下白米饭。妻子曹氏不穿绫绢做的衣服，役使的奴婢侍妾，才十几个人。打败宇文文化及后，获得一千多名隋朝宫女，当即遣散。大量任用隋朝官员。派遣使节到洛阳朝见皇泰主，皇泰主封他为夏王。开始的时候，他和王世充联合交好。待王世充自立为帝，与王世充断绝了关系。王世充侵占了窦建德的黎阳，窦建德便攻破殷州报复王世充，从此，郑、夏两国关系恶化。等到唐军逼近洛阳，王世充派遣使节向窦建德求救，先是不加理睬，坐观唐、郑相斗。至武德三年十一月，唐强郑衰几乎成了定局，中书侍郎刘彬向窦建德建议：“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今唐起兵攻郑，从秋到冬，唐军日见增多，郑国地域狭小，唐强郑弱，势必不能支撑，郑灭亡，夏也不能单独存在了。如果放弃仇怨，发兵救郑，夏从外袭击，郑自内反攻，一定能打败唐军。唐军退兵后，再慢慢观察形势变化，如果郑可取就取郑，合并两国的兵力，趁唐军疲劳，可以夺取天下！”窦建德听从此论，派人见王世充，答应出师援救，率军渡河南下。次年二月，攻克周桥（今山东菏泽附近）；三月率众西向，以救洛阳。攻陷荥阳后，水陆并进，很快就抵达成皋（今河南汜水）的东原。窦建德还派使者赴唐军，请求唐停止进攻洛阳。

这样的局势，唐军是没有预料的。如何决策呢？李世民召集将佐们商议。意见很不统一。记室薛收说：“王世充保据东都，仓库充实，统帅的兵马，都是江淮地区的精锐，现在的困难只不过是缺粮。因为这个缘故，被我们拖住，想打打不了，要坚守又难以持久。窦建德亲自统帅大军远道赴援，也会尽出其精锐。如果放他到此，两寇合兵，将河北的粮食运来供给洛阳，那么大战才展开，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统一天下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了。现在我们应当分出兵力围困洛阳，加深壕沟，增高壁垒，如果王世充出兵，要小心不和他交战。大王您亲自率领骁勇精锐，先占据成皋，磨快兵器，训练兵马，等他们到来，以逸待劳，一定能够克敌。打败窦建德后，王世充自然也就败亡，不出二十天，就会捉住两个国君。”李世民十分赞赏他的计策。但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不同意此论，认为：“我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王世充凭借洛阳宫城坚固辅以防守，不容易很快攻克。窦建德挟胜之势而来，士气高涨锐不可挡，我军腹背受敌，不是好办法，不如撤退保守新安，以便等待时机。”李世民说：“王世充损兵折将，粮食吃尽，上下离心，我们不必花气力攻打，可以坐等他败亡。窦建德刚刚打败了孟海公，将领骄傲，士卒疲惫，我们占据武牢，等于扼住他的咽喉。他如果冒险作战，我们可以轻而

易举打败他；如果他犹豫不决，不来交战，要不了十天半个月，王世充自己就会溃败。破城后兵力增强，士气军势自然提高，一下打败两个敌人，就在这一仗了。如果不迅速进军，窦建德进入武牢，周围各城新归附，必然不能坚守；两敌合力，势力必然强大，怎么会有机可乘呢？我的计划决定了！”屈突通等人又请求解除洛阳之围，凭借险要以观敌军变化，李世民不答应。于是，李世民把军队平分为两部分。由屈突通等人辅助齐王李元吉围困东都，他自己率领三千五百名骁勇向东奔赴武牢。李世民率领的部队于当日正午时分出发，过北邙，至河阳，取道巩县而去。王世充登上洛阳城墙望见唐军行动，不知意图，不敢出城交战。

武德四年3月25日，李世民进入武牢。次日，他带领500名骁骑，出武牢，到城东二十多里处，观察窦建德的营地。行进中，李世民在沿途留下随行的骑兵，分别让李世（责力）、程知节、秦叔宝统领，埋伏在路旁，自己只带四人一同前去。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拿着弓箭，你持长枪跟着我，就是来一百万人又能拿我们怎么样？”离窦建德营地三里处，李世民与窦建德的巡逻兵相遇，巡逻兵以为他们是侦察军情的斥侯。这时，只听李世民一声大喊：“我是秦王！”随即，拉弓搭箭，射死对方一员将领。于是，

窦建德出动五六千骑兵追赶。跟随李世民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李世民对随从说：“你们只管在前面走，我和敬德殿后。”他勒住缰绳慢慢走，追兵赶上了就拉弓放箭，每射一箭都杀死一个人。追兵惧怕，便停止追击，停了一会儿又重新追赶，几次三番，每次追赶上来必有人被杀死。不多时，李世民射杀了几个人，敬德杀死十几人。这样，追兵不敢再进逼。埋伏在沿途的李世（责力）等人也奋力战斗，大败追兵。返回营地后，李世民致函窦建德：“王世充曾与您修好，但已经反复，现在王世充的灭亡就在眼前，却花言巧语引诱您，您于是就率领三军之众，来听命于他，千金军费，白白为别人消耗，实在不是上策。如今和您的前哨相遇，他们不堪一击，您与王世充还没能相见，能不心中有愧吗？我所以稍挫您的锐气，是希望您能听从善意的劝告，如果您不听，恐怕会后悔莫及。”

窦建德在武牢受唐军阻挡不能前进。在此停留了一个多月，其间，打了几仗都未能取胜，于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归。而唐军接连胜仗，气势大振。在这种情况下，祭酒凌敬献上一策：出动全部兵力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再跨越太行山，乘虚入上党，略地汾、晋，奔赴蒲津。如此，既可以占领河东之地，拓土得众；又将威胁关中，逼使唐军后撤，以解东都洛阳之围。窦建德准备按凌敬的建议行事，但是，王

世充连续不断地派人来告急，王琬、长孙安世也日夜哭泣，请求窦建德援救洛阳，又暗地里用金玉收买窦建德手下的将领，这些将领便阻挠执行凌敬的计划。诸将都说：“凌敬是个书生，哪里懂得打仗的事，他的话怎么能听呢？”于是，窦建德对凌敬说：“现在大家士气很高，这是上天在帮助我，趁此机会决战，必定能大胜，不能照您的意见办了。”凌敬再三争辩，窦建德不高兴，命人把他架了出去。窦建德的妻子曹氏说：“凌敬的话不能不遵从。现在大王从滏口趁唐国空虚，连营渐进夺取山北并、代、汾、晋等地，又借助突厥从西部掠夺关中，唐军必然回师自救，还用担心郑国的东都之围不解吗？如果在此地停顿不前，磨灭了士气，消耗了财力，要想成功，就没有日期了！”窦建德说：“这不是女人能懂的！我来救郑，郑如今处境很危急，就要亡国，我弃他而去，是畏惧敌人而背信弃义，不能这么做！”

决战终于展开。武德四年五月一日，秦王李世民北渡黄河，逼近广武，侦察敌情，乘机留下一千多匹马，在河中沙洲放牧以引诱窦建德，他自己当晚返回武牢。次日，窦建德果然倾巢而出，陈兵汜水，连绵二十里，擂鼓前进，声势赫赫。李世民登上高丘瞭望敌阵，对诸将说：“敌人从山东起兵，还没有碰见过强大的对手，如今身涉险境却很喧嚣，是没有纪律，

逼近城池排列战阵，有轻视我们的意思。我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自然就会衰竭，列阵时间一长，士卒饥饿，势必就会自动撤退，我们乘机追上去攻击，必然会取胜。我和各位打赌，一过正午，肯定能打败他们。”窦建德确实轻视唐军。他派出三百骑兵涉过汜水，在离唐营一里的地方停下，然后传话给李世民：“请挑选几百名骑兵和他们打着玩玩。”李世民立即派王君廓带领200名长枪手应战，互相交锋，骤进骤退，不分胜负。各自返回营地。接着，王琬骑着隋炀帝的青骢马，配崭新的铠甲和兵器，来到阵前向众人夸耀。李世民说：“他骑的马真是匹好马！”尉迟敬德请求去夺马，李世民制止他说：“怎么能为了匹马损失一员猛士呢？”敬德不听，旋即和高甑生、梁建方骑马直冲入敌阵，一会儿，活捉王琬，牵着青骢马奔回唐营。

到了中午，夏军士卒已饥饿疲惫，都坐了下来，争着喝水。窦建德迟疑着想撤退，李世民见状，立即命令宇文士及带三百骑兵经过窦建德军阵西边往南奔驰，并告诫他：“敌人如果不动，就带兵返回，如果敌阵动了，就从东面出击。”宇文士及一到，果然动了，李世民说：“可以打了！”这时，放牧黄河滩的战马也已返回。于是，下令出击。李世民率领轻骑率先猛冲，大军跟随在后，东涉汜水，直扑敌阵。灭顶

之灾转眼就到，可窦建德还在举行朝谒。这样，当唐军骑兵突然临近，朝臣们都不知所措。慌乱之中，很难组织有效的抵抗。而唐军所向披靡，在夏军各个阵营大伐大砍，杀得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建德军队迅速被击溃，建德本人中枪，退至牛口渚被俘。李世民斥责作为俘虏的窦建德：“我们讨伐王世充，与你有什么相干，竟跑到你的领土之外，来与我们交战！”窦建德说：“现在我不自己来，恐怕以后还得烦您远途去攻取。”

取得对夏战争胜利以后，秦王李世民押解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郭士衡等人到洛阳城下，显示给王世充看。王世充流着泪和窦建德接话。王世充召集诸将商议突围，准备南奔襄阳。众将领都说：“我们依赖的是夏王窦建德，如今夏王已被俘，我们就是突围，最终也无法成功。”迫于形势，在5月9日，王世充身穿素衣，带领郑国的太子、官员及其他2000人到唐军营门投降。李世民按礼节接受他们的投降。王世充俯下身体，汗流浹背。李世民说道：“你总认为我是个小孩，如今见了小孩，为什么这么恭敬？”王世充叩头谢罪。

武德四年7月9日，战功赫赫的秦王李世民凯旋。在齐王李元吉、李世（责力）等25员战将前面，李世民身披黄金甲，威风凛凛，英武非凡。一万匹铁骑

在军乐的伴奏下，雷霆般驰在长安的宽阔道路上。到太庙，李世民献俘获的王世充、窦建德以及隋皇家的车驾、御物，举行仪式祭祀祖先。

十月，唐高祖见到王世充，历数其罪行。王世充说：“我的罪固然该杀，但是秦王准许我不死。”次日，下诏赦免王世充，把他作为平民，和兄弟子侄安置到蜀中。同日，在闹市中将窦建德处斩。因为防守人员尚未配备好，王世充一行暂时被安置在雍州宫衙房内。被王世充所杀的独孤机的儿子、定州刺史独孤修德听说后，带着兄弟们到王世充停留的地方，假称有敕令传唤郑王，王世充和兄长王世恽跑出门，被独孤修德等人杀死。

第八节 击败黑闼

在秦王李世民攻克东都洛阳、凯旋长安以后没几天，也就是武德四年七月中旬，窦建德的旧地发生了一件使唐王朝后来下了很大功夫才平息的事件：

一段时间以来，在清河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的一块地里，有一个汉子在忙着种菜。其实，种菜非他所长，只是一种掩饰的方式。这位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黑闼。刘黑闼小时与窦建德为友。隋末参加瓦岗军。武德元年瓦岗军失败，被王世充俘虏，不久率部逃到河北跟随窦建德。因刘黑闼处事果断、骁勇多谋，极受窦建德器重，被封为东汉公。窦建德失败以后，他回到漳南故里隐居，一边种菜，一边观察局势，等待时机。这一天，他的住处突然来了几个人，都是窦建德的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以及高雅贤等。来做什么？策划反叛。他们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形势所迫。原来，窦建德败亡后，唐朝的官吏实行严厉惩处的办法，使窦氏旧将惊恐不安。前几天，唐高祖下命令，征召他们几个人。范愿等人会到一起商量：“王世充以洛阳降唐，他的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都遭满门抄斩；我们到长安，肯定也逃不脱。自大业十年以来，我们这些人身经百战，早就该死了，

现在为什么还吝惜余生，而不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呢？况且夏王抓住唐淮安王李神通，以客人的礼节相待，而唐抓住夏王却马上杀了他。我们这些人都是夏王的亲信，现在不替他报仇，以后拿什么见天下的人？”于是，决定反叛。经过一番占卜求卦，认定一位姓刘的能够带来吉祥，便首先去见窦建德的旧将领刘雅，想请刘雅出山担任首领。刘雅不愿意，说：“天下刚刚安定，我打算在乡下养老，不想再起兵！”众人很生气，又怕起兵计划被泄露，便杀了刘雅。随后，他们去拜见在漳南隐居的刘黑闥，刘黑闥欣然从命，当即杀了耕牛和众将领一起，边吃边商定大计。精心部署以后，于7月19日袭击并占领漳南县，宣布起兵反唐。后又筑坛祭奠窦建德，向窦的亡灵昭告他们起兵的意图。

刘黑闥的行动得到河北相当多人的拥护，纷纷响应，势力发展很快，一些州县相继陷落，官吏不断遭到杀害。反唐的火焰大有燎原之势。据史籍记载：

8月12日，刘黑闥攻陷霸县，唐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和他交战，均失败身亡。刘黑闥重新得到他原来的残部及全部武器装备，拥有2000人马。

8月22日，刘黑闥攻陷历亭县，杀害唐屯卫将军王行敏。

曾在窦建德时期当过深州刺史的崔元逊和几十名同党，埋伏在盖满稻草的车上，直接冲入州府衙门，杀了唐任命的深州刺史裴 ，割下首级送给刘黑闼。

10月6日，刘黑闼攻陷瀛州，杀死唐瀛州刺史卢士睿。观州老百姓捉住刺史雷德备，以城归顺刘黑闼。

毛州百姓董灯明等人暴动，杀死刺史赵元愷响应刘黑闼。

11月19日，刘黑闼攻陷定州，捉住唐总管李玄通。刘黑闼爱惜他的才能，想任命他为大将，李玄通不从命。李玄通原来的部下送给他酒肉，李说：“各位可怜我身受囚禁之辱，幸以酒肉来开导安慰我，我要为各位一醉方休。”酒喝到兴头上，李玄通对看守说：“我能舞剑，希望把刀借我用一下。”李玄通舞完后举刀自杀，剖腹而死。

27日，杞州人周文举杀死刺史王文矩，以城响应刘黑闼的部队。

12月3日，刘黑闼攻陷冀州，杀唐刺史鞠陵。

12日，刘黑闼追击唐将李世（责力）等人，杀了唐军5000名士卒，李世（责力）只身逃跑。

……

武德五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年号为天造，设都城于豪州。窦建德时期的文武官员全部恢复

了原来的职位。刘黑闥的法令行政，全部效法窦建德。

武德五年正月八日，秦王李世民受唐高祖之命率军进至获嘉（今河南获嘉），开始了在唐初统一战争中指挥的最后一个战役。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刘黑闥放弃相州（今河南安阳），退守豪州（今河北永年）。十四日，李世民收复相州，进入肥乡，列阵于豪水附近，逼近刘黑闥军营。

唐幽州总管李艺（原名罗艺，隋末任虎贲郎将。武德元年归唐后，赐姓李，封燕郡王）率所部数万人会见李世民讨伐刘黑闥。黑闥闻讯，留兵万人，命范愿守豪州，自己率主力抗击唐军。夜晚，刘黑闥宿营沙河（今河北沙河县北沙河东）。唐军善于造势，为了威慑范愿的部队，唐将程名振带六十面大鼓，在豪州城西二里处的河堤上猛擂，声音极大，连城中的地面都感到震动。范愿惧怕敌人来攻，惊慌失措，急告黑闥。于是，刘黑闥迅速返回豪州，让弟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率军一万，攻打李艺于鼓城（今河北晋县）。正月三十日，双方在徐河（今河北徐水县）交战，结果，刘十善、张君立大败，损失八千人。同日，豪水县人李去惑举豪水县城降于李世民军。李世民派王君廓率一千五百名骑兵入城据守。二月，刘黑闥回师豪水，行至列人县（今河北肥乡东北），遭到秦叔宝的截击，刘黑闥失利。十七日，李世民收复邢州（今河

北刑台)，李艺则夺占定、栾、廉、赵四州，抓获刘黑闥的尚书刘希道，后与秦王会师于豪州。

刘黑闥猛攻豪水县。豪水城四周的护城河有50步宽，黑闥便在城东北修筑两条甬道用来攻城。李世民三次带兵救援，均被黑闥阻击，无法前进。世民怕王君廓守不住城池，便召集众将领商议对策，行军总管罗士信请求代替王君廓守城。李世民准许，于是，登上城南的山顶，用旗语告王君廓，王奋力厮杀，突破包围，罗士信率兵200乘机进入城内。黑闥挥军昼夜猛攻。这几天，恰逢天降大雪，李世民的救兵无法增援。经过八天苦战，至2月25日，豪水城被攻陷，捉住唐猛将罗士信。刘黑闥素来知晓罗士信的才干，本不想杀害，但罗士信言辞态度强硬，黑闥遂将其斩首，当时罗士信仅20岁。2月29日，李世民攻拔豪水城。三月，李世民与李艺于豪水城南扎营，以部分兵力屯于豪水之北。刘黑闥多次挑战，李世民坚壁不战，却派奇兵切断了刘黑闥的运粮道。

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闥相持60多天。其间，双方都采取袭扰的策略打击对方。一天，唐将李世（责力）带兵逼近刘黑闥军营。刚刚被黑闥封为左仆射的高雅贤，在宴会上喝多了酒，头脑还不清醒，便单枪匹马去追逐李世（责力），被李世（责力）的部将潘毛刺下马，随从继后赶到，扶高雅贤回营，未到营地就死

了。刘黑闥从冀、贝、沧、瀛州运粮，水陆并用，唐将程名振率兵截击，弄沉了运输船，烧毁了运粮车。同样，刘黑闥也暗中偷袭李世（责力）军营，李世民闻讯，迅即带兵突袭刘黑闥的背后，结果被刘黑闥包围。尉迟敬德率壮士冲入包围圈，李世民和略阳公李道宗才趁势脱险。李世民判断刘黑闥部队的粮食将尽，必定决一死战，于是派人在豪水上游筑坝截断河水，准备在交战的适当时机，决堤水淹敌军。3月26日，黑闥率两万步兵、骑兵南渡豪水，逼近唐军营寨列阵，李世民率精锐骑兵将黑闥骑兵击败，接着，又以铁骑冲踏黑闥的步兵阵营。黑闥率军拼死力战，自中午战至黄昏，黑闥军渐渐不支，无法再坚持下去。这时，王小胡对刘黑闥说：“我们智能体力都已耗尽，应该快点逃走。”刘黑闥和王小胡逃走，其余的将士并不知道，继续格斗。唐军看时机已到，决开堤坝，河水顷刻间涌到战场，水深一丈多，刘黑闥的军队大败，一万多人被杀，几千人溺死，黑闥和范愿等200人逃入突厥，山东（指太行山东）大部分地区被唐军占据。

刘黑闥在突厥，参与了颉利可汗攻占代州，杀害总管定襄王李大恩的军事行动。6月1日，刘黑闥在突厥的支持下，侵犯山东（太行山以东）。6月17日，侵犯定州。他的旧部属曹湛、董康重新召集兵马

响应。九月，刘黑闥再次攻陷瀛州，杀死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盐州城反叛归附刘黑闥。河北一带的局势再度动荡。

10月4日，在秦王李世民已于七月奉诏回长安的情况下，唐高祖任命齐王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率军进击刘黑闥军。五日，贝州（今河北武城）刺使许善护与黑闥弟刘十善战于夏津，许善护全军覆没。六日，唐右武侯将军桑显和于宴城（今河北束鹿东北旧城），将黑闥军击败，而此时唐观州刺史刘会却举城降于刘黑闥的部队。

10月17日，唐淮阳王李道玄率军三万，与黑闥军战于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由于副将史万宝与李道玄不和，史万宝率主力在后，按兵不动，结果，李道玄失败，被斩首。黑闥军消灭李道玄后，又击败了史万宝。李道玄死时才19岁，李世民深为痛惜，说：“道玄常跟随我征伐，见我深入敌阵，心中羡慕想要模仿，才会这样。”李道玄的败死，使山东唐军极为震骇，唐豪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弃城西逃，其余州县皆叛离唐军，归附刘黑闥。十日之内，黑闥完全收复了旧地。27日，黑闥进入豪州。11月3日，唐沧州刺史程大罗为黑闥所迫，弃城逃走。齐王李元吉，畏惧黑闥兵强，不敢进兵。11月7日，唐王朝经过一番微妙的策划，诏命太子李建成率军进攻刘黑闥，

唐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各州均受建成调度，并可自行决定征战大事，先行后奏。

十一月，刘黑闥率军南下，自相州以北的州皆归附黑闥，只有魏州总管田留安坚守不降，刘黑闥攻打魏州（今河北冀县）不下，便突然改变攻击目标，向南攻下元城（今山东莘县西南）。刘黑闥回军再攻魏州，仍无效果。这时，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大军已经到达昌乐（今河北南乐西北），刘黑闥率军迎击，但两次列阵，都没有打就停下了。魏征对太子说：“以前打刘黑闥，他的将帅都预先写上名字处以死罪，妻儿被俘虏，因此，齐王前来，虽有诏书赦免刘黑闥党羽的罪过，但他们都不相信。如今应当全部放掉那些被囚禁和俘虏的人，加以安慰晓谕并放走，这样，就可以眼看着刘黑闥的势力分崩离析了！”太子听从了这个意见。不久，黑闥军粮尽，士卒多逃跑，有的甚至捆着首领投降唐军。黑闥怕城中唐军杀出，与李建成大军内外夹击，便乘夜逃遁。黑闥行至馆陶，因永济桥尚未修好，无法渡河。二十五日，太子、齐王率大军赶到馆陶，刘黑闥让王小胡背河列阵，抗击唐军，自己督促架桥，架成后立即过河，但这时的黑闥军已无斗志，成溃散态势，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桥不坚固，唐大军刚渡过一千余骑，桥梁毁坏，使刘黑闥得以和几百骑兵逃脱。

刘黑闥被唐军追赶，日夜奔逃无法休息。武德六年正月五日，刘黑闥和随行一百多人，到达饶阳，他们十分饥饿、疲惫不堪。刘黑闥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出城迎接，并请入城，黑闥不进，诸葛德威便流着眼泪反复请求，刘黑闥看他很诚心的样子，就答应了。他们进城后在旁边的市场上稍事休整，吃些食物。可是，还没吃完，诸葛德威就带兵来，把刘黑闥抓了起来，送给了太子李建成。刘黑闥和弟弟刘十善在豪州被斩。临刑前，刘黑闥叹息道：“我有幸在家种菜，却被高雅贤这些人害得落到如此下场！”

第九节 喋血禁门

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短短的一年里，李渊父子及其决策集团“同心运始”，还是比较团结的。建成与世民共同首战西河，分别统率左、右三军，紧密配合，直取长安。然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便发生了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抢夺皇位继承权。

这场斗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显赫，一方面他本人逐渐地产生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引起了李建成的妒忌。自晋阳起兵至攻克长安，建成的战功几乎和世民一样；而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则更显得突出了。武德元年十一月，讨平薛举父子，唐高祖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下对秦府将领殷开山说：“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可见，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在某些人眼里他俨然是“真英主”了。

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府记事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

“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世民听了，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可见，他这时已经萌生了想当“天子”的念头了。

唐初统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使秦王李世民威望骤增。武德四年七月，当他返回长安时，身披黄金甲，后面跟随着25名大将，铁骑万匹，军乐鼓吹，真是盛极一时。冬十月，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就给世民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天策府可置官属，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天策府实际上是秦王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对此，以太子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威胁。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闥第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洗马魏征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闥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乘机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建成只是位居嫡长，就其功绩与声望来说，远不及世民。唯有通过创立军功，深自封植，才能维持太子的地位。因此，建成立刻同意此议，李渊也马上批准建成出征。过去，每次重大战役

都是李世民挂帅的；现在改换李建成，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置，目的是想压抑日益强大的秦王府，以加强东宫的实力地位。

自武德五年十二月讨伐刘黑闥第二次起兵后，唐王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化。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水火不容，从激烈的暗斗演变为一系列的公开争斗。唐太宗曾经回忆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李渊）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所谓“废立”，恐怕是自我吹嘘而已。但是，李世民不为兄建成和弟元吉所容，遭到种种倾轧，则完全是事实。须知，李渊的三个儿子，各自拥兵，构成三大集团势力，即太子东宫，秦王府和齐王府。在建成与世民的争斗中，元吉倒向谁，就会加强谁的力量，将呈现为二比一的形势。东宫和齐府的联合势力，“共倾世民”，对秦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平定刘黑闥之前，世民和元吉之间友好共事，并无矛盾。变化的关键在于元吉跟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闥，很快就被拉拢过去了。元吉其人，勇猛有力，在统一战争中也立过战功。然而，他骄逸放纵，名声欠佳。当他目睹兄长们争斗的公开化，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他也企图取得皇位的继承权，如果继续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投靠李

建成或许有利些，因为在他看来，“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一旦建成得志，元吉“终亦不事其兄”。这就是元吉被建成拉了过去的的原因所在。

由于东宫与齐府的联合，秦府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武德六年下半年，世民屯守并州，再也没有从前那样显赫的军功了。年底回来后，直至武德七年六月，又遭到了冷落与排挤。元吉曾经劝建成除掉世民，甚至说：“当为兄手刃之！”还有一次，世民随李渊来到齐王府第，元吉竟派刺客暗杀，经建成制止才没有得逞，元吉恼怒地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以李世民为首的秦府和以李建成为首的东宫之间，彼此采取种种手段，打击对方，壮大自己。无论是在后宫、外朝还是在地方上，几乎都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李建成，一派支持李世民。至于唐高祖李渊的态度呢？既然坚持嫡长制，那就要维护建成的皇太子地位，不准许世民染指。李渊也没有完全倒向建成一边。如果真的那样做，唯建成意愿办，那么，秦府的势力早就被铲除了。李渊试图摆平三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对于建成与元吉的某些暗算世民的不轨行为，知道了还以制止的。例如，“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不对，元吉遂退。”但是，李渊总的态度和做法，不可能协调双方的矛盾，结果反而使互相对垒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武德五年以前，因李世民的军功卓著，秦府远比东宫和齐府神气。但是，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世民既无新的战功，又屡遭兄弟的倾轧，秦府逐渐地处于劣势了。就军事实力而言，东宫加上齐府要比秦府强大。建成与元吉私募骁勇，多达数千人，而李世民“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从政治影响来看，建成是皇太子，每当李渊外出时，总是由他留守京师。妃嫔、大臣以及各地都督，依附于东宫的相对多些。建成扬言：让秦王“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这话难免有点自我吹嘘，但是，世民在京师处于不利的地位，则是事实。

因此，李世民及其秦府僚属都深怀忧惧。李世民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陆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答以策动政变，完全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据说，李世民曾与灵州大都督李靖商量，李靖表示不愿干。和行军总管李世（责力）商量，也不愿干。为什么呢？显然是他俩只看到秦王府的劣势，未能预料到事变的胜利。而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认为，只有果断地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三人密谋策划，“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后来，房、杜被逐出了秦府，长孙无忌就和舅父高士廉以及秦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继续进行策划，“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按过去的惯例，大多由李世民警军抵御。这次建成提议李元吉和李艺出征，目的在于防止世民掌握兵权。元吉故意要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等一道去，想借此机会把秦府精兵转到自己手里。然后，进一步谋杀李世民。这个密谋被太子率更丞王X知道，偷偷地告诉了李世民。

世民立即跟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危急，祸在朝夕，唯一的出路是先下手为强，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了。尉迟敬德鼓动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面对即将发生的“骨肉相残”的局面，考虑的当然要比别人多些。他并不是犹豫未决，而恰恰是深思熟虑。他找了不少府僚商量，还秘密地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共计其宜。据说，房、杜开始“不敢奉命”。李世民竟勃然大怒，要尉迟敬德拿佩刀“斩其首持来”。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决！

经过周密的策划，最后决定在玄武门伏杀建成和元吉。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地位重要，是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之所。当时负责门卫的将领是常何。据常何墓志铭记载，此人在武德五年底跟随建成讨平河北，即平定刘黑闥第二次起兵。武德七年，常何已被秦王世

民收买，担负玄武门的守卫之事。李世民还收买了玄武门的其他一些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应当说，在京师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在玄武门将领身上打主意，这确实是老谋深算。

六月三日，当李世民完成了政变的部署之后，密奏建成与元吉“淫乱”后宫，并且陈述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为什么说建成“似为世充、建德报仇”呢？世民无非是表白自己只是因平叛之功而被猜忌，这样就可以把相互残杀的责任全部推到建成与元吉的身上了。李渊一听，不禁愕然，决定第二天问个清楚。

6月4日，李渊先召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商量。三个儿子来到之前，李渊和大臣们一直在太极宫中“泛舟海池”。他们没有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当然，他们更不清楚李世民已经通过常何的关系，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伏兵于玄武门。

后宫张婕妤探知世民的动静，立刻向建成报告。建成找元吉商量，元吉提出：“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而建成却认为：“兵备已严，当与弟之参，自问消息。”看来，“兵备已严”是事实，

建成早就对京城的军事力量私自作了准备，而且以为旧属常何在玄武门，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建成没有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就和元吉一道入朝。行至临湖殿，觉得有点反常，正想拔马东归宫府，李世民随而呼喊，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带领70骑奔驰而来，射杀了李元吉。

过一会儿，东宫与齐府精兵2000人结阵猛攻玄武门，由于张公谨闭关以拒之，不得而入。原来屯守玄武门的一些将士采取观望的态度，认为“事未可知，当且观变”。但是，玄武门屯营将领敬君弘早已被李世民所收买，这时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甚至献出了生命。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同时，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组合势”。总之，在秦府僚属的全力抗击下，玄武门始终掌握在李世民手里。这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着，东宫、齐府的部队“鼓噪欲入秦府，（秦府）将士大惧。”因为就兵力而言，李世民“兵不振”，寡难敌众；而且将领大多集中在玄武门，秦府处虽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在，毕竟力量单薄，万一失守，也是关系到全局的成败。所以，秦府将士们惊恐不已。这时，尉迟敬德出了个好主意，他提着建成和元吉的

首级，展现在东宫、齐府将士面前。那些将士看到自己的主人已经人头落地，便无斗志，纷纷溃散。

战斗接近尾声，李世民就叫尉迟敬德向李渊报告情况。敬德一身戎衣，擐甲持矛，李渊一看就知道已经出了乱子，便问裴寂等怎么办？萧瑀、陈叔达进言：“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李渊只好同意，并写了“手敕”，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听从秦王的处置。同时，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诸将卒，事变最终平息下来了。

6月7日，唐高祖李渊下诏立世民为皇太子。诏文说：“皇太子世民夙稟生知，识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字内，九官惟序，四门以穆。朕付托得人，义同释负，遐迩宁泰，嘉慰良深。自今后军机兵伏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这里，所谓“义同释负”，未必是由衷之言，充分肯定秦子世民的“文德武功”，倒是体现了立贤的原则。至于规定今后军国庶事，不分大小，一律先由皇太子处决，这就表明李世民实际上开始执政了。

过了几天，李渊又提出：“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了要早些退位的意愿。八月癸亥，正式传位于太子。甲子，李世民即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正月，改

元“贞观”，开始了“贞观之治”的新时期。

第十节 稳定政局

唐太宗刚执政时，形势十分复杂，问题堆积如山，由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策略，稳定了政局，为“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妥善处理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6月4日以后，东宫、齐府余党纷纷逃亡。对于东宫和齐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开始是实行高压政策的。建成的五个儿子和元吉的五个儿子，株连被杀，绝其属籍，似亦太过分了。当时，“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唯独尉迟敬德坚决不赞成，争辩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不扩大打击面，确实是安定政局的重要策略。李世民同意了，“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可是，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上述规定，“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微幸者争告捕以邀赏”。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6月4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采取这些宽大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唐太宗还对东宫府属中杰出人才大胆地加以信任与拔用。建成曾收罗了一批骁勇的武将，这些人出身事主，往往很讲义气。如将领薛万彻，带兵攻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于终南山。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又如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6月4日建成被杀后，他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率兵攻玄武门，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又声称“微以报太子矣！”足以说明此人是建成的“心膂”。6月5日，他前来请罪，李世民斥责说：“汝在东宫，潜为间构，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汝罪二也。”但是，一旦冯立表示悔改，李世民就“慰勉之”，授以左屯卫中郎将。冯立激动地说：“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李世民的 policy 有效地促进了东宫党羽的转化。

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召回流放于（崔乃）州的东宫官属王珪、韦挺，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做身边的顾问。原太子洗马魏征的例子尤其突出。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严厉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魏征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听，

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贞观六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的心情说：“魏征往者实我所讎，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执而用之，何惭古烈？”这是何等的“弃怨用才”的雄豪气度。

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唐太宗特地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刺”。按照《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这样做法，既可以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能表白唐太宗的仁爱之心。所以，以礼改葬那一天，唐太宗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建成后嗣。

礼葬建成前夕，魏征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联名“上表”说：“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刊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

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因此，唐太宗乐而答应，命令原东宫、齐府僚属统统前往送葬。通过隆重的礼葬活动，原来十分激烈的秦府与东宫、齐府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消除了。

其次，采取措施安定山东地区的局势。李世民与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推行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建成开始得早，收效也大些。平定刘黑闥第二次起兵时，根据魏征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对比一下李世民平定黑闥第一次起兵时的残酷镇压，人们自然对建成有所好感。此后，建成利用自己在河北地区的威望，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建成与元吉被杀的消息传来，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互相勾结，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

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先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驰镇洛阳”。这显然是

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作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

随后又及时地选派魏征宣慰山东。魏征本来是山东人，周静帝大象二年生于襄国郡巨鹿县。家境孤贫，通晓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怒涛，把这位属意纵横之士卷了进去。正如魏征在《述怀》诗中所说：“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他在李密的瓦岗军里典掌过书记，十次向李密献计，表现了他的“奇谋深策”。后随李密降唐，“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致书徐世（责力）归附。不久被窦建德河北义军所俘虏，被拜为起居舍人。建德失败，魏征投奔于李建成，很受器重，曾提出“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可见，魏征和山东、河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即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封魏征为谏议大夫，“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当魏征到达磁州时，恰好遇着州县官把前东宫、齐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辄送诣京师”。原来，建成与元吉的亲信已经逃往河北了。魏征跟副使商量说：“东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接着，就自行把思行等释放了。这个措施，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

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所以，唐太宗知道后，十分高兴，对魏征更加信任。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诏免关东赋税一年。“老幼相欢，或歌且舞。”不久又变卦，重新颁布敕令，说“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关东地区百姓们大失所望。这时，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征立即上书，强调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魏征的慷慨陈词，显然是要唐太宗注意自己的政策在关东地区的影响，切不可贪图小利，重新惹起山东人对李唐王朝的嫌忌与不信任。由于魏征的积极“宣慰”，妥善处理各处关系问题，山东、河北局势逐渐地平静下来。

李唐皇室出于关陇地主集团，而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任用山东人士。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敏锐地注意到：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可见，山东、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

色山东人，用来稳定山东局势，魏征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然而，唐太宗有时囿于地域的偏见，未能公平地对待关中与山东人士。魏征宣慰山东前夕，曾向太宗指出：“不示至公，祸不可解”。也就是说，如果失之“至公”，山东人就会产生怨恨，甚至结群思乱，天下就难以太平。对此，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因此立即请魏征“安喻河北”。贞观元年，“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这话深深地打动了太宗的心弦。张行成是定州义丰人，少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唐太宗说过：“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为什么如此器重，让他预议大政呢？原因就在于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山东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门，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门。例如，魏征是小族之家，境况孤贫；崔仁师似系高门中的破落户；张行成的先世无名望，当为卑微寒族。此外，受唐太宗重用的还有：张亮以农为业，家境寒贱；戴胄出身低微；马周是个寒士，等等。因为这些人大多经历隋

未战乱，跟关东普通地主联系密切，熟悉民间的情况，所以，唐太宗利用他们，迅速地稳定了山东、河北地区的政治局势。

再次，审慎地调整最高决策集团。唐高祖时先后有十二位宰相，几乎都是皇亲元勋或者是贵族、士族。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与李渊友谊颇深，参与起兵密谋，拥有“佐命之勋”，故在武德之朝崇贵无比。可是，李世民却和他历来有矛盾。在皇位的激烈争夺中，裴寂公开袒护李建成。因此，唐太宗曾当面斥责他说：“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

唐太宗处理裴寂问题是很讲究策略的。从形式上看，裴寂还是受到尊重的，贞观元年，食封一千五百户，比所有的功臣都多，居位第一，实际上被剥夺了预议政事的实权。贞观三年，发生沙门法雅案件。据侦查，裴寂和那个心怀“怨望”的法雅有牵连，就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乡。“寂表乞住京师，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长安令王文楷坐不发遣令，笞三十。”不久，有人扬言“裴公有天分”。裴寂惶惧，竟然唆使他人杀人灭口。唐太宗知道后，愤怒地宣布裴寂的四大罪状：第一条，“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条，“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条，“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

条，“阴行杀戮以灭口”。最后说：“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贬流于静州。

武德时宰相中也有支持李世民的，如陈叔达、萧瑀和宇文士及等。这三位分别出身于陈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思想上比较守旧，缺乏进取精神。唐太宗即位后，就逐渐地把他们从宰相的职位上调换下来，另作妥善的安置。武德九年七月，罢免出身于隋朝宗室的中书令杨恭仁，由宇文士及接替。同时任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十月，萧瑀和封德彝发生矛盾，愤愤不平。接着又跟陈叔达在殿廷上争吵，声色俱厉。“瑀、叔达皆坐不敬，免官。”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去世，又以太子少师萧瑀为左仆射。九月，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十二月，“左仆射萧瑀坐事免。”总之，萧瑀等重臣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很难胜任宰相的职务了。“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征、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唐太宗虽然罢免了陈叔达、萧瑀等相职，但仍旧把他们当作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礼待之。例如，时常慰劳叔达，重温旧谊。“后坐闺庭不理，为宪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听以散秩归第。”宇文士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死后陪葬昭陵。

至于萧瑀，唐太宗称赞他“守道耿介”，后来图形于凌烟阁，拜为太子太保。总之，这些处置，有利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

唐太宗整顿决策集团的关键，在于把秦王府旧属和亲信包括从东宫争取过来的杰出人才，提拔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积极地去治理国事。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刚立为皇太子，就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这样就组成了以太子李世民为首的决策机构。除宇文士及外，无忌和士廉是亲戚，其他都是秦府武将或者“十八学士”；而且大多在玄武门事变中做出过贡献。

同年七月，以高士廉为侍中，宇文士及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这就为李世民正式即位作了组织上的必要准备。贞观元年，封德彝死后，由长孙无忌补为右仆射。贞观二年正月，无忌自动辞职。杜如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同年二十月，又把原东宫旧属王珪提拔到相位上来，守侍中。贞观三年二月，以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守秘书监，参

预朝政。经过几年的调整，至此，唐太宗完成了最高决策集团的重建工作。左仆射房玄龄明达政事，右仆射杜如晦引拔士类。“至于合阁规模，皆二人所定。……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房、杜为相，共掌朝政，为实现“贞观之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十一节 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以后，曾主持开展过一次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当时面临着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持怀疑态度的不少。连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致治”缺乏信心。唯独魏征满怀信心地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是很有见地的。大臣封德彝等却大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什么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他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魏征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魏征也不客气，他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复说明乱后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决策。

天下怎样才能“大治”呢？唐太宗和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所谓“静者，为化之本”，这就是“安人理国”的根本方针。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

位。这时，北方突厥扬言以“将兵百万”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之北。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坚决实行“安人理国”的方针，他挺身而出，订立了“便桥之盟”，突厥撤退回去。事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因为“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这说明，唐太宗所谓“安静”，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

任何施政方针都是不断完善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唐太宗所谓“安静”又包括了新的内容。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议“止盗”对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同年同月，唐太宗强调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贞观元年，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以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和静为农本的经济思想为其基础的。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事

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唐太宗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百姓的存亡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有一句名言：“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是君主的安危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同时，唐太宗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必须在经济上十分重视农业这个根本问题。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唐太宗的农本论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不违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

从这些话里，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

唐太宗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具体地说，他的重农政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一）推行均田，奖励垦荒

要使百姓“安静”，首先要有田可种。经历隋末丧乱，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间，皇室内争激烈，均田令并未认真贯彻。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切实地推行。但是，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不可能彻底实行的。诚如元代马端临所说：“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较少的地区即“狭乡”，农民群众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亩。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村落侧，向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对于受田不足的情况，唐太宗深感忧虑。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即“宽乡”，以便给足田数。贞观元年，关内旱灾，粮食歉收，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贞观二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客地附籍的客户。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据后来编纂的《唐律疏议》卷十三解释：“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如果“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的，可以免除赋役负担：“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之类。”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愿。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视灵口后，“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以上证明，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

（二）租庸调法与“轻徭薄赋”

唐初赋役称为租庸调法，它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修订于武德七年四月，受田户每年纳粟二石，叫做租。

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绢代役，一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计六丈，叫做庸。纳绢二丈，另加丝绵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调。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色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租庸调法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或调整。

实际上，唐初的减免租赋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国家仓库犹虚”，没有丰裕的物质条件。因此，“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结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鉴于此，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例如，贞观元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历史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敝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既然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弊之事”的负担，也就意味着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

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至于限制役使民工，唐太宗还运用《唐律》，从刑法上加以约束。《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唐律》对违令者予以刑事处罚，显然意在防止滥用人力。

（三）劝课农桑，不守农时

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施行之日，盛况空前。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天子亲耕藉田的古代仪式，自东晋以后。唐太宗鉴于前代不重农事的教训，采取“躬御耒耜”的举措，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含义与作用。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诸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一个帝王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这正是唐太宗的

开明之处。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州县时，“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当然，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例如，贞观五年，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遣兵以备仪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贵农，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皇太子的冠礼是国之大事，唐太宗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违农时的重视。再如，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间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

《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疏议》解释：“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这里，所谓“非时兴造”，就是农忙时动工，违反农时，故被视为“非法”，体现了唐

太宗“不夺农时”的与民休息思想。

（四）兴修水利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唐太宗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绝，治水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例如，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600余家。唐太宗下诏自责，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毁坏很多地方，唐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巡视，足见他对水利设施的关注。

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据《唐六典》卷七载，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此外，还制订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所谓《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唐太宗执法较严，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务必惩处。如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浅塞不能进”。次年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阳”，遭到“除名”的处分。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例如，贞观十八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因江都

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又如，沧州刺史薛大鼎，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上疏建议开河。经批准后，在百姓的辛勤劳动下，终于疏通了。百姓为之作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驱，美哉薛公德滂被。”接着，他又疏通了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势低凹的沧州免除了“夏潦”的威胁，“境内无复水害”。总之，贞观一代，约兴修了二十余处的水利工程。

除上述措施以外，应当提及的还有：设置义仓，救灾备荒。以藏粮备荒为宗旨的仓储制度，古已有之。隋文帝开皇年间尤盛。唐承隋朝，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新的改进，使仓储制度更加完备；增殖人口。隋末战乱，人口疾减。武德年间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的户数1/4。唐太宗即位后，十分关心户籍的变动情况。因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当时人口稀少则是不利的条件。所以，贞观时期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一是赎回外流到突厥的人口；一是奖励婚嫁，生育人口。唐太宗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人口迅速增长。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虽然还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间增了180万户；再就是释放宫女。这项措施跟奖励婚嫁、增殖人口的指导思想相联系。据记

载，唐太宗即位后，曾两次释放过宫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顿宫殿，放还宫女3000余人。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前后两次释放的总数，如唐太宗本人所说：“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百人出。”

唐太宗推行的这一系列重农政策，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慢慢地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景况。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征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贞观六、七年是关键年份。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接着，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粮价从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三钱，说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上述措施，以往的封建王朝也有执行的，为什么唐初收效尤其显著呢？关键的原因是唐太宗能够以隋亡于扰民废业为鉴，警惕自己务必“抚民以静”。他曾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他决心不做殷纣之类“苦民之君”，而要做“治民之主”。由于唐太宗能切实推行重农政策，因而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第十二节 选贤任能

贞观年代，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唐代初期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政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认识正确，政策对头，胸怀宽阔，不存偏见，真正实现了选贤任能。

到了贞观晚年，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时，曾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这样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真正知人又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唐太宗说的那样：“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处理好知人问题上的这两个“未必”，要有辩证思想，一不能固执己见，自己可能有失察之处，二不能尽听众言，众口一言可能也有片面之语。唐太宗正是这样做的，因而他对辅佐大臣的品议无不恰当、中肯。他评价长孙无忌，优长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劣势是“总兵攻战，非所

长也。”品评高士廉，长处是“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而所缺少的是“骨鲠规谏耳”。唐太宗还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知”。他说：“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要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一个人是真贤还是假贤，是完全贤还是部分贤，只有在举用之后也就是使用中才能确切了解。对此，魏征十分强调：“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知人困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而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掌握“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唐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是，竟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封德彝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驳斥道：“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国家达到大治的，难道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诋诬同时代的人呢？”贞观二十一年，他再次强调：“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朕常常要扬长避短”。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扬长避短”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明证。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史载玄龄用人不求全责备，

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被唐太宗称为贤良的宰相。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默契配合，共掌朝政，中央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人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为“房杜”。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根据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夕即）。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

唐太宗即位以后，百废待举，为了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进而大治天下，需要选拔和使用大批人才，但是，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了太多的动乱，都不愿意出来做官，至使政府官员人数不够。为此，唐太宗采取措施，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太宗广开才路的措施归纳起来，大体有四条：

11 士庶并举。君主选拔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极为常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大弊政。唐太宗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

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就更优越了，王珪、韦挺、魏征、马周均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还扩大科举制，让更多有才能的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同时也不排斥使用有才能的士族地主，包括山东士族地主。

21 官民同申。贞观三年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马周的选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周本是“山东布衣”。在州里教书时，屡遭地方官斥责，以至于不得不辞职；在州里游历，途中又受到县令侮辱；住在驿舍中，驿舍主事人见他衣衫褴褛瞧不起他，把他冷落在一边。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唐太宗居然让他做了大官。那是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议。这时，马周正好在中郎将常何家里作客。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提不出什么建议，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很奇怪！常何识字不多，奏章怎么能写得这样好，提的建议又这样头头是道呢？便问常何是怎么回事。常何只好如实说是他的朋友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听罢，非常高兴，立刻召见马周。马周一时没到，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到和马周交谈之后，发现他的确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更加高

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31 新故同进。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贤能，只要贤能，不管是故旧还是新进，都一视同仁。原秦王府的有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他是非常信任的，而对隐太子李建成手中的有识之士，即所谓“昔仇”，他也加以重用。以魏征为例。魏征少时孤贫落迫，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被战败后，又被窦建德俘虏，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后，入唐为太子洗马，曾献过除掉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多次让魏征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初授谏议大夫，后擢待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人臣。魏征也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唐太宗说：“魏征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见。”唐太宗对亲故也是重视贤能在上，庸才低能者不用。他常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被评

一等的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五人很不服气，他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的时候，臣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辛苦。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来没有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比我高。这实在不公平！”唐太宗听了之后，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闥，仓皇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这么一摆，李神通不得不服气。还有一些将领，原来是唐太宗早年作秦王时的老部下。唐太宗当了皇帝，他们没能得到高升，很不满意，吵吵嚷嚷地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唐太宗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我只能用新人，不能用旧人。你们发怨言，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国家着想。”

41 汉夷并用。唐太宗在用人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重视汉族的能臣名将，也不歧视夷族，对夷族名将也倾心信用，这是十分难得的。他根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分任朝廷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争结束以后，太宗夸奖他廉正，赐给他从高

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丈。铁勒族酋长契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赤水源一战，唐将薛万均、薛万彻破围，兄弟二人均中枪，随从骑兵死伤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军契何力率数百骑前往救援，拚力厮杀，所向披靡，薛氏兄弟才得免一死。后太宗擢其为北门宿卫。

由于唐太宗广开才路，吸引和任用了不少精英，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贞观一代，真是人才济济。图画于凌烟阁的24位功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萧瑀、段志宏、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贲）、秦叔宝等。唐太宗经常去凌烟阁观赏画像，以表示对这些英才的赏识和纪念。此外，被唐太宗器重的还有著名的文学之士如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如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还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契何力、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智勇。

通过广开才路，人才选拔和任用以后，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忠心耿耿，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唐太宗在这方面也是做得

相当成功的。

做法之一是：信任贤才，“洞然不疑”。历代不少君王的一个通病，就是用人多疑，因而使君臣之间不能肝胆相照，相互信任。唐太宗深知君王多疑的害处，吸取前人的教训，对贤臣猛将采取“洞然不疑”的态度。贞观十七年，萧瑀以自己不受重用，嫉忌房玄龄，诬告房玄龄“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还进而谗毁“此辈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谳知，但未反耳。”唐太宗严厉批驳了萧瑀的诽谤。武德年间，李世民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猜测敬德必叛，未经请示，囚于军中，力劝秦王赶快杀掉。李世民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其宽心，还赠送金宝。敬德被秦王的赤诚相见感动至深，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敬德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汗马功劳。一次，有人密报长孙无忌职位过高，荣宠过度，太宗将此密报让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心里装着各种传闻又不明说，则君臣的想法便有所不通。”后又召集百官公开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待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

做法之二是：用人司职，各负其责。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号召素有贤名的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进宫，

问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自作主张，独自处理日常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尽其事，自己拱手安坐，清和静穆，考察他们的成败得失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张玄素建议的基本点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放手让官员去干，君主不必事事插手，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避免像隋朝皇帝那样的用一个脑袋去思考、处理天下事务的弊政。唐太宗赞赏张玄素的建议，并能够身体力行，付诸实施，这从几年以后的一次谈话可得到说明。贞观四年七月二日，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临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传送餐饭。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不赞同此论，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精明而喜欢苛察，不精明则上下不通气，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费心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道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

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这一篇谈话，可以看作是唐太宗实行张玄素建议的一次总结。

做法之三：斥小人，杜谗邪。要使贤能之士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疏远小人、不用小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唐太宗对魏征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他把用小人比作“养恶草”，“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还引用北齐、隋朝历史教训，说明群小之徒诽谤君子、谗害贤臣给国家造成的极大危害。他说：“我看前代说人坏话的邪佞小人，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有的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如果国君昏庸，没有不因此被迷惑的，忠臣孝子就要为此含冤受罪了。所以，兰花正在茂盛，秋风却来败坏它；君王想要明察事理，谗言小人却去蒙蔽他。这类事记载在史籍上，不能一一列举。至于北齐、隋代时期小人谗言惑主的事，我所听到、看见的，简单地给你们说一说。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威名震

撼敌国。北周每年冬天要砸破汾河上的封冰，就是担心他率兵西渡来进攻。等到斛律明月被祖孝徵谗言构罪遭杀害以后，北周开始有侵吞北齐的打算。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帮助隋文帝完成霸业，执掌朝政20多年，天下依靠他得到安宁。隋文帝偏听妇人的话，一味排斥他。到后来他被炀帝杀害，隋朝的法制政令从此衰败了。另外，隋太子杨勇统率军队，代理朝政，前后20年，本来就有储君的名分。杨素欺骗文帝，残害善良的人，使他们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一下子失去了先天的本性。叛逆祸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了。隋文帝已经混淆了嫡子和庶子的名分，结果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国家不久就覆亡了。古人说：‘世道混乱，谗言得逞’，确实不是虚妄之言。我常常防萌杜渐，以此禁绝谗言构罪的发生，仍然担心还没有尽心尽力，或者还不能觉察它的苗头。前代史书说：‘猛兽居住山林，藜藿之类野菜就无人敢去采摘；忠臣执掌朝政，奸邪小人也就停止阴谋活动。’这确实是我对你们的期望。”为了防止奸佞小人对贤能之士的损害，唐太宗决定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唐太宗对房、杜的长处和缺点都了如指掌，没有能够使陈师合的弹劾得逞，断定陈师合是“妄事毁谤”，便

对他采取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贤能之士毕竟不是神，有时也会有小的失误和过失。居心叵测的人往往抓住不放，借机毁谤。对此，唐太宗态度十分明朗，总是保护贤能之士。比如，魏征、温彦博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曾有小的过失，一些人据此上奏太宗弹劾他们，太宗丝毫不理，对他们的信用不变，使他们安心任事，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第十三节 计破突厥

隋末唐初，东突厥又强盛起来，常常南下骚扰。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经向东突厥称臣。唐朝建立以后，东突厥颉利可汗（启民可汗的儿子）和突利可汗（颉利可汗的侄子）认为他们对唐朝的建立有功劳，屡次派人到长安索取金帛，还多次骚扰北部地区，严重地威胁着唐朝北部边境的安全。

唐太宗刚即位不久，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就率领大军，进犯唐朝。先头部队来到离长安只有40里的渭水便桥北岸，震动了长安城。是战，是和？满朝大臣议论纷纷。当时，唐朝的兵力不如突厥，但是唐太宗毫不示弱，决心征服突厥。他扣留了进城刺探情报的突厥使者，布置好军马，准备抗敌。接着，亲自率领六名骑兵，飞奔渭水河边。颉利可汗见对岸有几名骑兵，跃马横枪，奔驰而来，马上出营，隔水遥望，见为首的正是李世民，不觉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唐太宗高声喊道：“颉利可汗，我与你订立盟约，互不侵犯，你为什么背弃盟约，侵扰我土？”几句话问得颉利哑口无言。唐太宗又指着天说：“我是天子，对不起我，就是对不起天。颉利可汗，你知道对不起

天的后果吗？”颉利不敢回答。他手下的士兵，本来就信鬼信神，见唐朝皇帝威风凛凛，自称天子，一个个急忙下马，向唐太宗跪拜。忽然，鼓声震天，旌旗招展，刀枪耀眼，原来是唐太宗紧急调来的军队已经到达，摆开一字长蛇阵，好不威武，颉利可汗以为唐军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怕打起来自己吃亏，就和唐太宗在便桥议和，带着唐太宗给他的金帛，引兵回去了。

这次事件之后，唐太宗就加紧训练士兵。每天在大殿前面带着将士习枪练箭，成绩优秀的给予奖励。他对将士们说：“突厥入侵，本是常事，可怕的是在安逸的生活中忘了战争，敌人来了就束手无策。现在我不让你们修筑花园，专教你们学弓箭，平时我是你们的老师，突厥入侵之时，我是你们的将帅，这样，中国的百姓就可以得到安宁了。”一位大臣向唐太宗进谏说：“法律规定，凡是带兵器到皇宫者，一律处以死刑。如今这些普通将士竟然在大殿上张弓挟箭，万一出点差错，陛下不是很危险吗？”唐太宗笑着说：“一个好的皇帝，应该把四海之内的百姓都看做是一家人，开诚相见，推心置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猜忌自己身边的将士呢？”将士们听到以后，都十分感动，人人奋发图强，抓紧练习武艺。没几年，唐太宗就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部队。

这时候，东突厥内部发生矛盾。颉利可汗和突利

可汗互相猜忌，颉利可汗随便增加税收，引起贵族内部不满，再加上天灾，牲畜死亡，百姓挨饿受冻，反对颉利可汗的人越来越多。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范君璋投降了唐朝。他占据的山西北部，正是进攻东突厥必经的要道。

唐太宗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大将，徐世（责力）等人为副将，率领十几万大军，由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分六路出兵讨伐东突厥。

李靖是唐朝著名的将领。他年轻的时候对兵法很有研究，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打过许多胜仗。他带领大军刚刚出发，突利可汗就带兵前来投降。唐太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太原起兵的时候，太上皇曾向突厥称臣，我一想起来就很痛心。今天突厥的可汗前来投降，可以一雪前耻了。”

第二年春天，北征大军传来捷报，李靖率领3000名骑兵，一举攻下定襄（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北），俘虏在突厥避难的隋朝的萧后和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

颉利可汗已经无力抵抗，他为了取得喘息的机会，派人向唐太宗求和。唐太宗看出了他的用心，为了麻痹敌人，就假意答应下来，并且派鸿胪卿（负责祭祀礼仪的官）唐俭出使突厥。随后，又让李靖带兵跟在

唐俭的后面。

李靖找徐世（责力）商量说：“颉利虽然战败了，可是还有很大的实力，如果让他逃走，等他恢复过来，又很难平定。不如来个突然袭击，捉住颉利！”徐世（责力）同意这个计划。于是李靖传令整队，趁天黑出发。李靖在前面带队，徐世（责力）在后面接应，沿途发现突厥的哨兵，一律抓起来，押着他们跟着队伍前进。

颉利可汗接到唐俭带来的诏书，以为唐太宗上了他的当，十分得意。他正设宴招待唐俭，突然哨兵进来报告说：“不好了，唐军离这儿只有七里远了！”原来，颉利可汗见唐朝派使臣前来议和，便放松了戒备，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慌，忙问唐俭：“这是怎么回事？唐天子既然同意讲和，为何又派兵来偷袭？”唐俭说：“可汗不必惊慌，李将军想必不知道皇上下了诏书，待我去告诉他。他知道以后，一定会撤兵，请可汗放心！”说完，唐俭急忙走出帐篷，骑马飞奔而去。颉利信以为真，仍然没做任何准备，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唐俭返回。

唐军逼近的警报一个接一个传来。颉利走出帐篷，只见漫山遍野都是唐军，便慌忙骑上千里马逃跑，手下的士兵也各自逃命。唐军闯入突厥营地，如入无人之地，东砍西杀。这一仗，李靖俘虏了十多万人，缴

获牲畜几十万头。颉利还没逃出多远，就被唐军活捉。东突厥从此灭亡了。

消息传来，唐朝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唐太宗在顺天楼接见李靖、徐世（责力）等将领，给他们很多奖赏。然后，又让人把颉利可汗带了上来。颉利可汗跪在地上请罪。

唐太宗斥责颉利说：“虐待百姓是你的第一条大罪；与唐朝屡次立盟而又负约，言而无信，是你的第二条大罪；恃强好战，屠杀生灵，是你的第三条大罪；多次入侵大唐境内，肆意烧杀抢掠，是你的第四条大罪；朕一再给你机会，好言招降，你拒不接受，这是你的第五条大罪……”听到这里，颉利吓得面无人色，汗如雨下。唐太宗说：“不过，自从便桥立盟以来，你没有大举入侵，还算有所顾忌，朕今天赦你不死，从今以后，你要改邪归正。”颉利可汗喜出望外，急忙磕头谢恩。

唐高祖听说李靖征服了突厥，抓住了颉利可汗，十分感叹地说：“当年汉高祖被匈奴困在白登，没能报仇雪耻。如今，我们能灭掉突厥，活捉颉利，真是扬眉吐气啊！”说完就让唐太宗和公卿大臣以及贵妃等到凌烟阁举行盛大宴会，庆贺胜利。宴会上唐高祖亲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翩起舞，一直欢乐到深夜。

从此，北部边境得到安宁，这为唐朝经济、文化

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四节 重视民心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待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穿衣吃饭为根本，凡经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根本。要不失时，只有皇帝不苛烦百姓才能达到。如果战争不断，营建不停，而想不占用农事的时间怎么可以做得呢？”

这一年，京城天旱，蝗虫大量滋生。太宗到禁苑中去视察庄稼，双手捧起几个蝗虫祝告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只该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就要吞下蝗虫，左右的人急忙劝说：“吃下去怕要生病，不能吃。”太宗说：“我希望灾难转移到我身上，还避免什么病呢？”说完，就把蝗虫吞了。从此蝗虫不再为害。

有一次，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饥饿困乏。当时国家的粮仓堆得满满的，但是不允许开仓救济，却命令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去。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爱惜仓库到这种地步。等到隋文帝晚年，总括国家储积的粮食，可以供给全国食用五六十年。隋炀帝仗持这样的富裕，所以豪华奢侈，荒淫无道，结果导致灭亡。炀

帝丧失国家，也同他父亲一样有责。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不在于装满朝廷的仓库。古人说：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那么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只要仓库的储粮能够防备荒年，此外何必劳烦储蓄。”

唐太宗做事情重视顺应民心。贞观元年，他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重视顺应民心。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就是因为民心希望这样做，他集中了百姓的心愿。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常常指责批评，就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不跟民心一致的缘故。我最近想造一座宫殿，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但是远想秦始皇的事情，就不兴建了。”

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扩建修饰宫殿屋宇，游玩观赏池台，这是帝王所希望的，而不为百姓所希望。帝王所希望的是骄奢淫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劳累疲敝。孔子说：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恐怕就是仁恕之道吧！自己所不情愿做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劳累疲敝的事，确实不能施加给百姓。我居于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处理事情都设身处地，真诚地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做百姓不希望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顺应民情。”在另一次与侍臣的谈话中，太宗用生动的比喻论述了对天下百姓实行仁义的重要。他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阔鱼就游动，仁义积聚

百姓自然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不知道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应当记在心里，经常使它继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的松懈怠慢，离仁义就已经远了。犹如饮食供养身体，常使肚子吃饱，才能够保存生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话，天下百姓真是太幸运了！”

贞观二年，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才十六七岁，容貌美丽，堪称绝代佳人，当时没有谁比得上她。文德皇后访寻到后，请求留在后宫，作为妃嫔，太宗聘此女，封为充华，诏书已发，但册封的使者尚未出发。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陆爽，就急忙进宫见太宗，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爱百姓，应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自古以来，有道德的君主，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所以君主住楼台亭榭，就想到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着美味佳肴，就想到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眷顾妃嫔之时，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国之君主应当经常想到的道义。现在郑氏的女儿，很久以前就许配给了别人，陛下聘娶她没有怀疑，也没有询问，此事传播到全国各地，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应有的道义吗？我听说的虽然还不十分准确，但深恐它会损害圣上的美德，不敢隐瞒事情。君王的一举一动，都要记录下来，我希望陛下特别留神

思考。”

太宗听了魏征这话，非常吃惊，亲自写诏书答复他，深深地自我责备，就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说：“郑氏女许配陆家，没有确切的证据，隆重的礼仪既然举行，不可中途停止。”此外，陆爽本人也上表说：“我的父亲陆康在世时，与郑家来往，有时互相馈赠资财，当初没有婚姻交涉为亲戚。”并说：“外人不知道实际情况，妄自有这样的说法。”大臣们又劝太宗娶郑女。太宗很狐疑，就问魏征：“群臣或许是顺从旨意，陆爽为什么这样分辩？”魏征说：“依我考虑，陆爽的本意可以知道，他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太宗说：“为什么呢？”魏征说：“太上皇刚平定京城的时候，得到辛处俭的妻子，稍蒙宠爱。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听到此事很不高兴，就下令将辛处俭调出东宫任万年县令。辛处俭常怀恐惧之心，经常担心不能保全头颅。陆爽认为陛下今天虽然宽容了他，但担心以后暗加谴责贬官，所以再三自我表白，本意就在这里，不值得奇怪。”太宗笑着说：“外边人的想法或许这样。然而我所说的话，不能使人一定相信”。于是发出诏书说：“现在听说郑氏之女，过去已经接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对此事没有详

细审查，这是我的不是，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充华的诏书应停止执行。”当时的人无不称赞感叹这件事。

第十五节 鼓励忠谏

唐太宗平定了突厥，巩固了边境，就集中力量治理朝政。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全国的民户还不到300万，只有隋朝的1/3。从洛阳到山东几千里土地上，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再加上灾荒不断，社会经济十分萧条。

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但是他亲身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他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造反的农民推翻了。所以，他当了皇帝，总是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对他的儿子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正，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啊！”他又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这些话说明唐太宗多少认识到了农民的力量，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爱护百姓，使社会安宁。

建国之初，唐太宗就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治理国政。有一次，他问大臣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古时候，把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判断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叫做“纳谏”。

唐太宗很注意纳谏。他曾经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几十张好弓，以为再也不会会有更好的弓了。不久前，拿给制弓的师傅看，他们却说，都不是好弓。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虽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自己过去鉴别的不精。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识别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情，我怎么能都懂得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准备自己到洛阳游玩的时候使用。给事中（专门负责向皇帝上书论述政令得失的官员）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修复洛阳宫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当年，隋炀帝修建洛阳宫，大兴土木，用2000人拉一根大柱，从几千里以外运到洛阳，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多么大的苦难。如今，战争刚刚结束，财力不如隋朝，人民的元气还没恢复，陛下却先修缮洛阳宫，这不是比隋炀帝还残暴吗？”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比桀、纣如何呢？”张玄素说：“如果这个工程不停止，陛下一定会得到和隋炀帝、夏桀、殷纣一样的下场。”尽管这番不客气的批评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唐太宗还是做了认真的考虑，觉得张玄素的话有道理。他感叹地说：“我考虑不周到，你说的很对。”于是立即下令停工，并且赏赐张玄素200匹彩缎。

还有一次，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罢了官。他跑到唐太宗那里求情，说自己多年在秦王府跟随唐太宗东征西讨，如今天下已定，自己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唐太宗很同情他，打算恢复他的官职。魏征知道以后，坚决反对。他对唐太宗说：“过去秦王府的人，现在官居要职的非常多，如果人人都仗着旧关系为非作歹，谁还肯做好事呢？”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对庞相寿说：“我过去做秦王，不过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做了君主，是天下的主人了，不敢偏袒老朋友。”说完便赏给庞相寿一些缎帛，打发他走了。

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个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君主看到里面记载着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唐太宗说：“有什么写什么，怎么会得罪君主呢？我很想看看国史上怎样写的，把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有什么不好呢？”房玄龄把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送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6月4日下面记载的有关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

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还说：“史官写历史，应该去掉浮词，直书其事，这样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一个小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栌阳县丞刘仁轨是个小小的八品官，他反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要求改在冬闲的时候进行。唐太宗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提升了他的官职，以示鼓励。

有一年，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派人把魏征叫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18岁，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可还是不服气。魏征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

现在不到 18 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不是说话不讲信用吗？”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魏征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二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被征当兵，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征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唐太宗才说：“我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又重新下了一道诏书，免征不到 18 岁的男子。从这以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了，并且提升他担任了太子太师这样高级的官职。

有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到洛阳，中途在昭仁宫（现在的河南省寿安县）休息，因为对他的用膳安排不周而大发脾气。魏征当面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怪百姓不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遭到百姓反对，灭亡了。陛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能知足，今天这样的食物陛下就应该满足了，如果贪得无厌，即使食物好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唐太宗听后不觉一惊，说：

“若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样中肯的话了。”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只有魏征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在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戒鉴。他对魏征说：“我现在知道我的过错了，我愿意改正，否则，我还有什么脸面和你相见呢？”

由于魏征处处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对皇帝的批评毫不客气，唐太宗对他既尊敬又畏惧。一天，唐太宗正在逗弄一只小鹞，看见魏征走进来，怕魏征责怪，急忙将鹞藏在怀中。魏征装作没看见，向唐太宗奏事，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的时候，鹞已经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顶撞我，使我下不了台，真可恶！”长孙皇后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只见她穿着礼服，恭恭敬敬地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很奇怪，问她贺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进谏；今天魏征敢直言，就是因为陛下圣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道贺呢？”唐太宗听了皇后委婉的批评，马上心平气和了。

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用铜镜照自己，可以看到穿戴是否整齐；用历史做借鉴，可以知道历代兴衰和更替的原因；看别人的成功和失败，可以汲取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

第十六节 实行科举

唐朝贞观初年，有一次，唐太宗想亲自看看考进士的情况。在发榜那天，他带着几个内侍，悄悄地来到考试进士的端门前，只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长的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内侍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指射箭的时候箭所能达到的射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才全都落到我的手中了。

唐太宗为什么那样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科举这种制度对他确实很有用。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由朝廷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分科考试，把统治阶级认为合格的人推举、选拔出来担任政府的官吏。这种制度是隋朝时候创立的，到了唐朝更加完备了。

唐朝的科举考试科目很多，其中进士科和明经科最受重视。明经科主要考贴经，就是把经书上的文字用纸贴上几个，让考生把它写出来，如同现在学校的填空试题一样。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写诗作赋比较自由，也便于表现考生的才能，所以当时的读书人都愿意考进士科。考进士科的人很多，录取很难，一百个人中只能录取一两个人。明经科比较容易，十个人中

就能录取一两个人。当时人们把考进士比做“登龙门”。有这样一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进士比明经难考，三十岁考中明经科已经算老了，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呢。

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是真正得到官职还要经过吏部（中央的人事部门）的考试。这个考试叫“选试”。选试合格的，呈请皇帝授给官职。选试的内容有四项：一是“身”，相貌外表要端正；二是“言”，言词要清楚；三是“书”，字要写得端正美观；四是“制”，要具有审定文字的能力。

考中了进士，叫做“及第”，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到武则天的时候，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有人把进士叫做“天子门生”，意思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

由于进士很难考，为了达到考取的目的，应考的举子就在考前和考试期间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活动。有的到处叩拜公卿，送礼物、献文章，想得到公卿的赏识，好替他向主考官推荐。有的甚至跑到官僚的车马前跪献文章，表示自己的诚意，这叫做“求知己”。有的把自己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写成卷轴，献给达官贵人或者名流学者，请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这叫“行卷”。行卷的第一篇十分重要，它往往决定看的人的印象好坏，所以举子们都十分用心。唐朝大诗人

白居易到长安应考，向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看见白居易的姓名，开玩笑地说：“米价方贵，长安居大不易”（长安米价正贵，居住很不容易），有点看不起白居易的意思。等到他打开行卷第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念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的时候，不由得大加赞赏，说：“能做这样的诗，‘居’亦‘易’矣！”于是，到处赞扬白居易的才华。

行卷促使一些读书人在应考以前认真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努力创作高水平的作品，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不过也造成了钻营、贿赂和投机的风气。

实行科举制度，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都由中央决定，这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同时也使大批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像家世毫无名气的李义府，怕自己不能参与政权，曾经写诗说：“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上林苑有许多树，没有一枝可以让我停留）。唐太宗回答他说：“我将全树都借给你，哪里只是一枝啊！”后来，李义府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最后做了宰相。

第十七节 公道执法

唐高祖刚刚打进长安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大仁慈，争取人心，曾经宣布，除杀人、抢劫、开小差和叛逆四项犯罪要处以死刑外，隋朝其他的法律一律废除。这在当时是很得人心的。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社会秩序很混乱，各地盗贼越来越多，严重地威胁着唐朝政权。唐太宗刚刚即位三个月，就急忙召集群臣商量怎样制止盗贼。一个大臣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重重地惩罚。”另一个大臣说：“盗贼越来越多，是刑法不严的缘故。”魏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对百姓要讲仁义，这才是王政。”唐太宗很同意魏征的看法，因为他心里也清楚，出现盗贼，是由于赋役繁重，官吏贪污勒索，百姓生活饥寒交迫造成的。严厉的刑罚只会激起百姓的反抗，隋炀帝不就是前车之鉴吗？于是，他下令由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和法官一起修订法律。

第二年，唐太宗下诏鼓励大臣们荐举人才。当时，全国各地等待荐举的人都集中在长安。荐举开始不久，就发现有人弄虚作假，谎报出身和资历。唐太宗很生气，命令弄虚作假的人赶快自首。如果不主动自首，查出之后就要处以死刑。不久，果然抓到一些谎报出

身的人。唐太宗交给大理少卿（司法官）戴胄负责审理。戴胄根据法律规定，判处这些人流刑（流放、充军）。唐太宗大发脾气，质问戴胄说：“我下过命令，不主动自首就要处死，而你却判了流刑，这不是让我失信于民吗？”戴胄镇静地回答说：“陛下如果查出弄虚作假的人不交给我审讯，就杀了他，我当然没有办法。既然交给我审讯，我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唐太宗拍着案子说：“你自己倒是得了执法的美名，却让天下人议论我说话不讲信用！”戴胄说：“陛下的命令只不过是凭一时的喜怒决定的。法律是国家向天下公布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守法才是最大的信用；按法律办事，就要能忍小愤而存大信（忍耐个人一时的愤怒而保存国家的信誉）！”唐太宗听戴胄说得有理，才转怒为喜，赞扬戴胄说：“你能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于是，他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加紧修订法律。

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精神不正常。一次，他正犯病，胡说八道，大骂皇帝，被人告到官府。唐太宗让大理寺丞张蕴古审理这个案子。张蕴古经过调查报告唐太宗说：“李好德患精神病属实，根据法律不应该判刑。”可是，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张蕴古的判决显然是包庇李好德讨

好李厚德。唐太宗联想起有一次他路过监狱，曾看到张蕴古正和囚犯下棋，这样的人，还能不包庇犯人吗？唐太宗越想越生气，下令处死了张蕴古。过了几天，唐太宗了解到李好德确实患有精神病，非常后悔，但是人已经死了，要挽回也来不及了。他赶快下了一道诏令：今后，凡是死刑，即使判决了，也要经过三次复核，才能执行。并且让长孙无忌把这一条写到法律中去。

过去的法律都规定，兄弟分居以后，官爵、功劳不能互相继承，但是犯了罪则要连坐（一起被判刑）。有一次，一个叫房强的人，他的弟弟因为对朝廷不满，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按照法律规定，尽管还没有行动，也要处死。房强虽然毫不知情，但是按照兄弟连坐的法律规定，他也得被处死。唐太宗审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很同情房强。他对房玄龄说：“谋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兴师动众，已经有行动；一种是讲几句反叛的话，还没有行动，这两种情况应该区别开来。”随后，唐太宗让房玄龄把言论罪和行动罪区别对待，只有言论没有行动的罪犯，他的弟兄不再连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新的法律修订完成了，这就是有名的《唐律》。《唐律》是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修定的，比起《开皇律》又有很大改进。它共分十二篇五百条，内容周详、简明，是我国

古代重要的法学遗产。

新法制定之后，唐太宗要求官员们遵照法律办事。他说：“法律不是为我一个人的，是天下人的法。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

有一年，发生了高甌生案件。高甌生是岷州（现在的甘肃省岷县）都督，是唐太宗的老部下，资格很老。一次，唐太宗任命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率领各路兵马讨伐吐谷浑。高甌生误了行军的日期，李靖要按照军法治罪。高甌生很不服气，他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信，以为别人不敢惩罚他。他还恶人先告状，到唐太宗那里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派人调查，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据《唐律》，唐太宗批准判处高甌生流刑。这时候，有人替高甌生求情，说高甌生是秦府的功臣，即使犯了再大的罪也应该宽恕，何况这么点小过呢！唐太宗说：“甌生违犯了李靖的军纪，又诬告李靖谋反，如果从宽处理，今后法律还怎么实行呢？国家的功臣很多，假如我赦免了甌生，别人犯法，我怎么禁止呢！甌生是我过去的功臣，我不会忘记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赦免他。”最后还是依法惩处了高甌生。

《唐律》在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但是，因为它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猛烈冲击下产生的，它吸取了隋炀帝苛刑峻法的教训，为了放松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条文定得比较宽平。这种法律的改革，

对于健全封建法律，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十八节 唐蕃和亲

正当唐朝繁荣发展的时候，在西部边境，一个少数民族的王朝吐蕃日益壮大起来。

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生活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吐蕃人勇敢善战，他们认为战死是光荣的，谁要是临阵逃跑，大家就拿一个狐狸尾巴挂在他的帽子上，嘲笑他像狐狸一样胆小。吐蕃人的首领称为“赞普”，意思是雄壮强悍的男子。

大约在公元62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统一了西藏各个部落。不到十年，论赞弄囊就被大贵族毒死了，吐蕃发生了内乱。松赞干布当时年龄还小，他依靠中小贵族，平定了叛乱，维护了吐蕃王朝的统一。他做了赞普，把都城迁到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制定了官制和法律，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

这时候，正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唐朝的文化，要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他第一次派遣使臣前往长安访问。唐太宗很快就派使臣回访。从此，汉藏两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不久，松赞干布派使臣，带着丰盛的礼物，到唐

朝向皇室求婚。唐太宗没有同意。使臣回到吐蕃，怕受到惩罚，编了一通假话，说：“刚到唐朝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欢迎非常隆重，同意将公主嫁给大王。后来吐谷浑王也来求婚，唐朝天子又不同意了。看来一定是吐谷浑在中间说了坏话。”松赞干布听了非常生气，马上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力量很弱，哪里是吐蕃的对手？刚一交锋，就被打败了。于是，松赞干布又派使臣带着厚礼去长安，并且扬言：“我们是来接公主的，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们赞普，我们的军队随后就到！”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讨伐吐蕃。松赞干布骄傲轻敌，结果被打得大败，收兵退回逻些。

松赞干布看到唐朝这样强大，既害怕又佩服。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他派大相（相当宰相）禄东赞带着黄金5000两、珍宝数百件，再一次去长安求婚。

传说当时到长安求婚的有五个国家的使臣，他们都带着贵重的礼物，想要娶唐朝的公主。究竟把公主嫁给谁呢？唐太宗决定出几个难题，考一考这些使臣，看谁聪明能干，再作决定。

唐太宗把各位使臣请到宫里，拿出一颗九曲明珠和一束丝线，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能把丝线穿过明珠中间的孔，就将公主嫁给谁的国王。”原来，这颗明珠有两个相通的珠孔，一个在旁边，一个在正中。

中间的孔道弯弯曲曲，所以叫九曲明珠。要想用一根软软的丝线穿过去，非常困难。几位使臣拿着丝线直发愁。禄东赞很快就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一只蚂蚁，用一条马尾鬃拴在蚂蚁的腰上，把蚂蚁放在九曲明珠的孔内，然后不断向孔里吹气。一会儿，这只蚂蚁便拖着马尾鬃从另一端的孔中钻了出来。禄东赞再把丝线接在马尾鬃上，轻轻一拉，丝线就穿过了九曲明珠。唐太宗见禄东赞这样聪明，很高兴。

接着，唐太宗又出了第二个难题。他让人把使臣们带到御马场。御马场左右两个大圈，一边是一百匹母马，一边是一百匹马驹。唐太宗要求使臣把它们的母子关系辨认出来。其他几个使臣束手无策，只有禄东赞想出了办法。他运用吐蕃人民在游牧方面的丰富经验，让人暂时不给马驹吃草和饮水。过了一天，他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了出来。只见母马嘶叫，马驹哀鸣，小马驹一个个跑向自己的母亲去吃奶，它们的母子关系就这样被禄东赞辨认出来了。禄东赞说：“马的母子关系已经辨清，请陛下将公主嫁给我们的赞普。”唐太宗说：“还要再考一次，然后决定。”

当天夜里，宫里钟鼓齐鸣，皇帝传召各国使臣入宫。其他几位使臣急忙穿戴整齐赶到宫里。只有禄东赞想得周到，他因为初来长安，路途不熟，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路，就让随从带着红颜料，在去皇宫途中

的十字路口都做了记号。原来唐太宗是请各国使臣到宫里看戏。看完戏，唐太宗说：“你们各寻归路吧，谁能最先回到住处，就把公主许给谁的国王。”禄东赞有记号指引，很快就回到了住处。其他使臣由于不熟悉路途，摸来摸去，直到天亮以后才找到住处。

经过三次考试，禄东赞都取得了胜利。唐太宗非常高兴，心里想：松赞干布的臣子这样聪明、机智，松赞干布自己更不用说了，于是，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难婚使”的故事，虽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从中可以看出藏族人民的智慧。

文成公主是唐朝皇族的女儿，她聪明、美丽，读书很多，很有才华。唐太宗为她准备了丰富的嫁妆，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日用器具、珠宝、绫罗、衣服，还有历史、文学书籍以及谷物种子等。公元641年，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

文成公主带着宫女、乐队、工匠、官吏和江夏王的卫队，浩浩荡荡地向吐蕃行进。松赞干布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到柏海（今青海省境内）迎接。在逻些，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服装，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赞蒙（藏语王后的意思）。松赞干布高兴地说：“我的先辈没有和上国通婚的，今天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荣幸。我要为公主建一座城，作为纪念，让子孙万代都知道。”

他按照唐朝建筑的风格，在逻些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城郭和宫室。

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去了许多经书、诗书、佛经、佛像和有关医药、生产、工艺等方面的书籍，还带去了大量的粮食、蔬菜种子和生产工具。那时候，吐蕃没有历法，以麦熟为一年，文成公主帮助吐蕃人推行历法。她还教吐蕃妇女纺织、刺绣。她带去的水磨，深受吐蕃人民的欢迎，使他们学会了利用水力资源。

文成公主信奉佛教，松赞干布在她的影响下，提倡佛教，修建了大昭寺。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供奉在寺里。文成公主带去的乐队，大大丰富了藏族的音乐。当时，松赞干布不断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去求学，唐朝许多有学问的人也被聘请到吐蕃掌管文书。唐朝还给吐蕃送去蚕种，派去养蚕、酿酒、制碾磨和造纸墨的工匠。先进的汉族文化传入吐蕃，对吐蕃生产和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唐太宗去世以后，唐朝和吐蕃继续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和密切的关系。

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去世了，她在吐蕃总共生活了40年。吐蕃人民为了纪念她，特地规定了两个纪念日。一个是10月15日，据说是文成公主的生日。这一天，吐蕃境内男女老少都到寺庙里祈福。

另一个是5月7日，女孩子们化妆跳舞，歌唱文成公主的事迹。直到现在，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里，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在布达拉宫里还保存着他们结婚洞房的遗迹。

第十九节 五大喜好

一喜弓箭。

生于北地、长于戎马的唐太宗，从小就形成了英武的性格，喜弓善射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晋阳起兵后，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弓箭从不离身。他所发射的箭，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能射穿门阖。房玄龄赞扬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统一战争中，与宋金刚对峙，反击单雄信的袭击、讨伐刘黑闼，他的箭都神助似的护卫他，使他化险为夷。他曾说过：“我用弓箭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箭够多了”，确实是这样。平定天下后，唐太宗作过两首诗，一首题为《出猎》，是反映他使兽惊鸟飞的娴熟弓法的，诗中写道：“干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另一首题为《咏弓》，以表示他对弓的特殊爱好：“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唐太宗即位后，虽然不必亲操大箭，驰骋战场，但喜欢弓箭，不减当年。武德九年九月，他在显德殿庭院中亲自担任警卫将卒“习射”的教练。每天有数百人参加，射中者赏以弓刀与布帛。朝臣从安全角度考虑，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听，一有空，就乐于当

习射教练。

二喜良马。

唐太宗爱马成癖，留下了一些咏马的诗篇，其中《咏饮马》为最好。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纓；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诗从动态畅写了饮马的各种形态，栩栩如生，如果没有爱马的深沉感情、相马的丰富经验，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唐太宗对一匹名为黄骠马的骏马，爱之极深。这匹马原是隋炀帝的青骠马。武牢战役中，被窦建德部将王琬骑出来挑战，李世民一看，赞叹说：“彼之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听到后，立即冲入敌阵，把王琬连同青骠马都擒获归来，成为唐太宗的坐骑之一，取名黄骠马，到贞观晚年还随他出征，途中死亡，他“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骠叠曲》。”

骏马立功，不仅生前受荣，而且死后雕刻在主人的墓侧让人凭吊。唐太宗晚年对选中的六匹战马最为得意，不仅生前爱之形影不离，而且死前还遗命雕刻六匹骏马以装饰昭陵，称之为“昭陵六骏”。对六匹骏马分别赐名为：飒露紫、特勒骠、拳毛狮、白蹄乌、青骠、什伐赤。六骏雕像据说由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唐太宗按图作赞，以酣畅的笔触赋其战功。飒露紫：“紫霞超跃，骨腾神骏；气腾山川，威凌八阵。”

特勒骠：“策应腾空，承声牛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拳毛狮：“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白蹄乌：“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青骊：“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什伐赤：“冰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昭陵六骏的雕刻家们，采取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把六匹骏马的形象塑造得极富战马气魄：造型粗犷，雄健有力，神态生动，质感强烈，或原地待命，或轻步徐行，或弛骋战阵，或腾空飞跃。现在要是去昭陵参拜，仍然可以领略六骏的非凡风采，也能够感受到唐太宗当年对战马的真切情思。

三喜围猎。

爱好弓马的唐太宗性喜围猎。即位后，多次在宫苑或猎场内围猎，既显出他高超的骑术与射术，也透露出他的某些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

贞观十一年十月，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策马近前与野猎搏斗，太宗拔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

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

对于唐太宗喜好围猎，不少朝臣持反对态度。但是，太宗有太宗的想法。一次，他对侍臣们说：“上书奏事的大臣们都说朕游猎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围猎不忘武备，唐太宗有这样的战备观念是应当肯定的，但说没有烦扰百姓则未必。贞观十四年十月，太宗将要去同州狩猎，刘仁轨上奏书说：“今年秋季粮食刚刚成熟，百姓刚收割十分之一二，让他们承担狩猎事，筑路修桥，耗费一二万工力，实在是妨碍农事。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个月，等到粮食收割完毕，则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太宗接受刘仁轨的建议，狩猎推迟了一个月。唐太宗作过一首《出猎》的诗，透露出他是选择农暇时节围猎的。诗中说：“楚天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岂若因农暇，阅武出 嵩。”诗中也进一步阐述了围猎是为了布阵练兵，不忘武备：“三驱阵锐卒，七萃列材雄；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唐太宗尽管频有出猎，但由于围猎时间绝大多数安排在十至十二月的冬闲季节，所以基本上没有造成扰民之害。

四喜诗文。

唐太宗以武功立国，无暇于文，而“晚始向学，

多属文赋诗”。他生前写了不少诗文。请人将他的诗文编入《全唐文》、《全唐诗》中，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

太宗的散文多属政论，史论、诏敕之类，有不少优秀的篇章。由于他是开国有功之君，政治经验丰富，统治历程艰辛，生活根基深厚，故政论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如《帝范》后序，总结自己一生功过，恰如其分，语多励人，非常精彩。他这样写道：“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唐太宗以君道自励，以慎终自勉，以吏事鉴今，以帝范训子，以忠谏察臣，以正直垂节。文章内容丰富，多涉戒奢、防骄、纳谏、任贤，宣扬王道，探究人事，励精图治，拨乱反正，直接为“贞观之治”的政治服务。

唐初诗作流传后世最多的当首推唐太宗。他的近半数诗，为宫廷咏物之作，此外为叙事、写景以及从

京城到地方巡游的帝王生活的描绘。他善于抒发政治情怀，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帝京篇》组诗共十首，以首写长安宫殿始，末以反省戒骄终。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之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诗句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末首六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指出治国不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政治上的自满和生活上的放纵。励精图治还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规劝，择善而从；明确法律条文，才能赏罚分明。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临民、剥削有节而称明君。

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由于他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宏篇。

五喜书法。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曾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论》，极力推崇王书。他不惜重金，广搜天下羲之遗墨，前后共得王真迹3600幅，以一丈二尺装成一轴，时时观赏，心摹手追，乐此不疲。虽然世间王书几乎被他搜罗殆尽，但唯独缺少王书珍品《兰亭序》。这幅用鼠须笔、蚕茧纸书成的名贴是王羲

之当年在兰亭修禊宴饮时的神来之笔，日后虽重写数本，均不及原稿，因此自己也极为珍视，交于子孙珍藏，传至七世孙陈代书家智永时，因他在吴兴永欣寺出家为僧，没有后代，便传给弟子辨才。辨才在屋梁上凿暗槛收藏，秘不示人。太宗经过仔细推究，断定《兰亭序》在辨才手中，三次召他查询，辨才均谎称不知。于是，太宗便采纳尚书右仆射房玄龄的计策，派监察御史萧翼伪装成商人与辨才交往，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用自己所带的内府中的王书真迹引出辨才手中的《兰亭序》，然后乘隙窃走。太宗得贴后，欣喜万分，放在座位旁早晚观赏把玩。又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摹数本，赐给太子、诸王及功臣。由于他的偏爱与大力提倡，一时间朝野上下，学王成风。除了辗转摹写之外，另创集王字刻碑新法。从此，神机流逸、迥媚缠绵的王氏书风便笼罩书坛。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太宗病卧玉华宫含风殿，临终前对高宗李治提出以《兰亭序》殉葬的要求。高宗遵其遗愿，用玉匣盛装真迹随葬于昭陵之中，以后，《兰亭序》真迹便永绝人世，后人只能从唐人摹副本去想见真迹的丰采了。对真迹的来龙去脉、传本的谱系真伪，千百年来人们聚讼不已，甚至清末还有人否定《兰亭序》为羲之所书。此疑案由于真迹沉寂地下至今悬而未决。

李世民以书家慧眼，首先认识到王书特殊的艺术价值，又依靠帝王之尊，将其推至“书圣”宝座，使羲之声名显彰、书艺光大，故功垂后世。但他同样以帝王之尊，将绝世珍品《兰亭序》攫为己有，乃至殉葬昭陵、毁迹人间，以了其个人生死不渝的翰墨因缘。

第二十章 虔诚佛事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转向虔诚，在他驾崩之年，曾数告玄奘：“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大有相见相逢晚，憾不广佛事之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联系当时环境，当与玄奘东归适逢其时有关。

玄奘，原姓陈，名祜，洛州缑氏人（缑氏，现在的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因为他精通印度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也有人叫他唐三藏。他的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13岁就出家做了和尚。唐朝初年，玄奘到四川研究佛经。那时候，四川比较安定，从各地来了很多有名的高僧。玄奘向他们请教，学问大有长进。他看遍了国内的佛经资料，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于是，他学习梵文，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现在的印度半岛）去学佛经。

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还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政府严禁百姓私自出境。官府拒绝了玄奘的申请，约好了的同伴都不去了。玄奘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公元627年秋天，他跟随一些商人由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走到甘肃西部，快到玉门关（唐朝边

境的最后一道关卡)的时候，玄奘骑的马死了，跟随他的两个小和尚也跑了，后面官府的差役又追了上来，玄奘躲在客店里，不知如何是好。瓜州的州官李昌拿着追捕文书走了进来，问道：“师父就是玄奘吧？”玄奘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李昌说：“师父如说实话，弟子可以给您想个办法。”玄奘见李昌态度诚恳，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李昌赞叹道：“师父决心取经，研究佛法，真了不起，我一定尽力帮助。”说完便撕碎了追捕文书，说：“师父赶快走吧，天黑就出不了关了。”玄奘又惊又喜，赶紧离开客店，奔向玉门关。

玄奘只身在沙漠中前进，一天中午，来到第一座烽火台。他正在马旁喝水，突然飞来一箭。过了一会儿，又是一箭。玄奘急忙朝着烽火台大喊：“我是长安来的和尚，要到西天取经，请你们不要射箭。”守卫烽火台的官兵弄清了玄奘的来历，都很敬佩，送他过了烽火台。到了第四座烽火台，烽官（守卫烽火台的将官）还留他住了一夜，给他准备了干粮和清水，并且嘱咐说：“第五烽烽官很坏，万一被他发现，性命难保，请师父绕道走吧！”

玄奘又继续赶路了。沙漠之中，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寒风似刀。有时候因为气流的急剧变化，会看到幻影，明明望到人群马队，走近了却又什么也没有，行人以为是妖魔鬼怪。沿途

到处是人马遗骨，断剑折枪。玄奘走了100多里路，口渴难忍，停下来喝水。不料，在取皮囊的时候，一失手，整个皮囊里的水全泼到沙漠上。茫茫黄沙，一望无边，到哪里才能再找到水呢？玄奘忍着极度的干渴，走了五天，最后昏倒在沙漠中。半夜以后，忽然凉风习习，玄奘清醒过来了。幸好前面不远就是一片绿洲。清清的泉水，嫩绿的野草，使他脱离了险境。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程，玄奘终于走出800里沙漠，来到了高昌国（在今新疆境内）。高昌王本是汉人，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很尊敬玄奘，苦苦请求玄奘留下来说法，答应给他优厚的酬劳。玄奘说：“我远游是为求佛，现在被大王阻留，大王只能留住我的身体，却留不住我的精神。”高昌王还是不让他走，他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高昌王深受感动，答应送他西行，并且送给他衣物、干粮、挑夫和30匹马，还给沿途各国写信，请他们保护这位远行的高僧。

此后，玄奘又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年，公元628年夏天才到天竺。在这里，他看到许多高大的鸵鸟；看到150尺高的石像和1000尺长的石刻卧佛像；还看到成群的巨象往来运输。他几次横渡恒河，遍访佛教史上的古迹。他访问了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那里有一棵五丈多高的菩提树，佛教

创始人释迦牟尼曾经在这棵树下苦修；他到了佛经中所说的西天灵山，参观了释迦牟尼说法的地址。这些实地考察，使玄奘对佛经的理解更深入了。

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常年有僧徒一万多人。玄奘到院的那天，1000多名和尚捧着香、花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寺的住持（当家和尚）戒贤，是个年过百岁的佛教权威，他早已不讲学了，但是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特地收玄奘为弟子，重开讲坛，用15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了最难懂的佛经。

玄奘夜以继日地钻研佛经，学习古代印度的语言，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那烂陀寺，能通晓20部经论的有1000人，通晓30部的有500人，通晓50部的只有10人，玄奘就是这10人中的一个。但是他并不满足。10年中，他在天竺到处求教，终于像戒贤一样，通晓了全部经论的奥妙。玄奘博学的声誉传遍整个天竺。

公元641年，玄奘路经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受到戒日王的欢迎。恰好这时候有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没有人能驳倒一个字。戒日王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决定在曲女城举行盛大的法会，公开辩论。

辩论大会举行的时候，戒日王邀请玄奘为论主（主讲人）。出席会议的有天竺十八国的国王和6000多名著名的教徒。玄奘坐在为他专设的珠宝床上说法，他举出许多倒子，反复论证他的观点，听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佩服的。他还把他所著的《破恶见论》挂在会场门口，征求答辩。辩论会进行了18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反对的意见。散会那天，各国国王拿出许多金钱送给玄奘。玄奘分文不要，全送给贫苦的百姓。

戒日王一再诚恳地挽留玄奘留在印度。还有一位国王甚至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来，愿意为他建造100所寺院。但是，玄奘怀念阔别十多年的祖国，他决心回国。临走的那天，戒日王以及当地的印度朋友，挥泪送了他几十里路。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初，玄奘带着650多部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了中国的都城长安。这时候，距离他从长安出发已经整整18年了。

玄奘当年出国是违犯禁令偷偷出去的，现在，唐太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很佩服玄奘的顽强精神，特地派房玄龄去长安迎接他。

正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长安城里人山人海，路两旁摆着香案和鲜花，锣鼓音乐，此起彼伏。长安的僧

尼数万人，排着队，把玄奘带来的经卷、佛像安置到弘福寺。

玄奘到洛阳朝见唐太宗，介绍了他的旅途所见所闻和西域、天竺各国的风土人情。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他劝玄奘还俗，帮助他治理国政。玄奘谢绝了。

不久，玄奘开始了翻译佛经的工作。他每天五更起床，三更才睡，19年间，共译出74部佛经，1335卷，1300多万字。他的译文流畅优美，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例如“印度”，就是他翻译的时候确定下来的。

长期艰苦的翻译工作耗尽了玄奘的精力。公元664年二月，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和杰出的翻译家在长安郊外的玉华寺去世了。

玄奘生前还和参加翻译佛经的辩机和尚共同编写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记载了包括今天我国新疆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名胜古迹和城市风光等，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经被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